



健康长久好生活



2021大中城市中产人群 养老风险蓝皮书



目录

报告摘要	01
一、前言	03
(一) 报告背景	03
(二) 研究主题	05
二、养老财富储备风险	06
(一) 养老财富	06
(二) 退休收入替代率	09
(三) 风险指数	10
(四) 敏感性分析	11
三、健康保障风险	14
(一) 医疗保险现况	14
(二) 健康风险的认知	16
(三) 健康支出的准备	18
(四) 健康保障方式的预期	21
四、养老规划认知风险	23
(一) 退休生活信心和预期	23
(二) 养老理财偏好和规划	27
(三) 认知规划存在的不足	29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30
(一) 调查主要发现	30
(二) 主要对策建议	31
附件一：调研问卷概况	33
附件二：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计算方法	36
附件三：专业术语解释	38

报告摘要

2021年6月至10月，友邦保险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社会保障实验室）和腾讯新闻，选择全国十大中城市线上收集5050份有效调查问卷，就养老财富储备现状与风险进行深入调查，据此编制了首部《大中城市中产人群养老风险蓝皮书》。报告将养老风险划分为养老财富储备、健康保障和养老认知水平三个维度，对居民未来退休生活面临的各项风险进行综合研判，并运用精算分析方法，编制了国内第一个“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现将主要发现和结论摘编如下：

一、调研背景

在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国家提出“夯实养老财富储备”的战略。新冠疫情冲击下，人们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为帮助公众更好地认知养老风险，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全方位做好养老规划，本次调研选择全国十大中城市探索养老风险问题。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覆盖十个典型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成都、南京、佛山、武汉、石家庄；调查样本总量为5050人，每个城市平均为500人左右。

调查对象为中等收入群体：调查样本年龄处于35-59岁，平均年龄为43.4岁；税后个人年收入为19.7万元；现有金融资产为78.4万元；拥有第二套及以上房产的人员比例为33.4%，房产平均市价为357万元。

调查样本平均参加社保年份数为14.3年，参保密度为79.5%；参加企业（职业）年金计划的比例为15.6%，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3.8%。

二、养老财富储备风险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Pension Wealth Reserve Risk Index，简称PWRRRI）是指全国（或单个城市）典型个体在退休时点面临的养老财富缺口，即退休时积累的养老资产权益与合意的退休收入目标之间的差距。其计算方式为：

第一步模拟测算退休总财富，包括养老金、金融资产和房产三项；第二步计算退休后首年的收入替代率；第三步将收入替代率与设定的目标替代率进行比较，缺口大小衡量为风险指数。在调研数据基础上，报告对典型个体未来的养老财富缺口和风险指数进行了测算，主要结果如下：

典型个体60岁退休时积累的养老总财富为690万元，其中，养老金财富为243万元，金融资产为252万元，房产为194万元。一线城市财富水平明显高于二线城市，不同城市在三项财富上呈现出不同分布结构。

典型个体退休后养老金风险指数为21.01%，这意味着，与50%的退休收入合意替代率相比，个人有超过20%的现金流缺口，养老财富储备缺口为145万元；如果将金融资产变现，风险指数下降到15.67%，养老财富储备缺口为108万元；进一步将房产（第二套房）纳入养老，风险指数下降到11.01%；即使这样，养老财富储备仍有76万元左右的总缺口。分收入层次看，低位收入群体主要面临退休收入替代率低的风险（相对于社会平均工资）；高位收入群体主要面临退休后收入水平下降的风险（相对个人退休前工资）。

典型个体社会养老金替代率为35.2%；社会养老金+企业年金的替代率为51.6%；社会养老金+商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为42.8%；三个层次养老金计划都参与的养老金替代率可达59.9%。在多层次养老金中，受访者中参与企业（职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比例均不足20%，对养老总财富储备影响明显。

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股票、保险、债券、基金和信托等金融工具）在家庭养老财富储备中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个体收入水平的提高，金融资产积累越高，退休收入替代率也越高。总体看，一线城市金融资产退休收入替代率高于二线城市。

无论是希望通过金融资产还是第二套以上的房产来养老，在现实中都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最主要的风险来源于贬值或被占用。

三、健康保障风险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个体参与各项医疗保险、健康支出水平和退休后健康管理意愿等方面的情况，主要发现如下：

受访者的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8.9%，但仍有5.4%的个体就业者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受访者中有53.2%没有购买任何形式的商业健康险。在购买商业健康险的受访者中，自报保额平均为12.9万元，其中，自报保额在10万元以下的占63.4%。

受访者中有20.8%参与了网络互助性质的互联网保险，22.9%购买了“惠民保”。

受访者中有74.5%对退休后“大病”的医疗费用表示担忧，70.0%对“慢性病”表示担忧，反映出大多数人认为重大疾病会增加退休后的经济负担。

在健康保障预期上，受访者普遍不乐观。63.1%认为基本医疗保险满足不了退休后半的医疗支出。

分别有50.4%和40.7%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或“比较愿意”为自己和家人在健康管理方面投入更多，但只有6.2%的表示愿意增加20%以上，受访者增加健康投入的行动力不高。

四、退休认知风险

通过调查问卷，对个体退休生活方式预期、金融保险知识和退休规划等情况进行调研，主要发现如下：

尽管大部分人表示“考虑过制定退休规划”，但“有想法并行动”的仅占28%，64.5%的受访者表示“想做但没有采取行动”或“不知道如何做”。

75.1%的受访者表示大多数时间有定期理财偏好，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偏好越强，但投资仍以银行存款为主，约占32.3%。

30.8%的受访者预期老年生活将由子女照顾，选择由配偶照顾和自己照顾的分别占21.3%和19.3%，选择由养老机构照顾的占21.4%。尽管受访者已意识到专业化和社会化照护服务的重要性，但仍没充分意识到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对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的意愿调查表明，近半数受访者认为“非常必要”或“有一定必要”从事兼职工作，认为“不太必要”或“完全不必要”的仅占11.8%和2.3%。可见“退”与“休”并不等价，通过兼职工作填补退休生活空白的意愿较强。

受访者中认为延迟退休（简称“延退”）对社保待遇有利的比例达到75%，说明大部分认识到延退是解决老龄化社会社保待遇的有效途径；但对于延退的年数，55%的受访者希望能不要超过三年，而愿意接受延迟五年退休的人只有16.2%。



01 前言

(一) 报告背景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夯实养老财富储备

“七普”数据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8.7%, 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5%, 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从“六普”到“七普”的十年间, 我国老年人口增加8640万人, 超过了联合国的最新预测。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 要使财富储备日益充沛, “鼓励家庭、个人建立养老财富储备, 稳步增加全社会的养老财富储备”。养老财富准备首次写入国家级文件, 凸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 我国各类养老资金积累约有12万亿元, 其中, 基本养老保险为6万亿元左右,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约为4万亿元, 全国社保基金约为2万亿元。此外, 大约1/5的人拥有寿险保单, 积累的保险责任准备金约有6000多亿元。在储蓄方面, 截至2021年6月个人存款已超过100万亿人民币, 较2014年底翻了一番, 但个人存款还未能有效转换为养老财富储备。总体上看, 国民养老财富储备仍然不足。

2. 疫情冲击提升健康风险意识, 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健康是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将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19年国家卫健委启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制定了详尽的方案。近年来, 随着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深化改革,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缓解, 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正在快速上升, 而个性化品质医疗也越来越受到中产人群的欢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大传播, 健康风险与保障再度成为热点话题。

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已基本实现全覆盖, 2020年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分别覆盖3.45亿人和10.17亿人, 全年医保基金总支出2.1万亿元。但医保的报销范围仍然有限, 个人自费医疗支出负担较高, 需要自主加入补充保障。2020年, 全国健康险的保险深度和密度分别为0.8%和579.5元/人, 远低于国际水平。健康保障的高需求与低投保率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这与保险意识、医保认知和健康管理方式等因素有关。

3. 帮助公众更好认知养老风险, 平滑生命周期内消费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已覆盖超过10亿人, 2020年有2.89亿人领取社会养老金待遇, 为老年人基本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赡养负担持续加重, 未来30年内将出现“一人缴费供养一人”的局面, 亟需大力发展补充养老保障, 以应对不断增大的财务压力。

我国人口当前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78岁, 80岁及以上的高龄人口大约有2500万人; 未来30年里, 高龄人数将翻两番, 突破1亿人。而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 预期未来人口寿命将越来越长, 大家都需要尽早为老年生活做更充裕的准备, 但在这一点上, 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其紧迫性。

4.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方位养老规划未雨绸缪

老年阶段是全生命周期的末端,劳动能力丧失,身体机能下降,慢病特病高发,失能风险上升,需要全方位早着手加以筹谋和规划。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已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未来五年将大力推进企业举办的年金制度以及个人商业保险计划。

目前,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大约7000多万人,还不到全国经济活动人口的10%,购买个人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的人数比例更低一些。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补充保险计划,反映出人们对未来养老风险的认知还不够,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度过于乐观和依赖,削弱了个人投保的主动性。亟需唤醒人们认知,尽早对养老做出长远且全方位的规划。

5. 选择大中城市进行先驱探索

大中城市人口集中,政策效果易于扩散,尤其是对养老金融和健康险产品的认知度较高,在消费、储蓄、养老和健康规划等方面也有引领作用。本报告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苏州、成都、南京、武汉、石家庄、佛山等准一线或二线城市作为比较,观察中青年人对未来养老、健康的风险认知水平。

主要目的有三点:第一,考察人们对老年生活可能发生的风险是否有充足的认知,在哪些方面认知度高,哪些方面认知度不够,现有的资源能否应对老年可能遇到的风险;第二,通过调研启发风险认知,考察人们是否愿意、是否知道如何为老年可能遇到的风险做出准备;第三,发布国内首个“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养老风险,引导社会力量瞄准养老需求,并为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二) 研究主题

本报告研究的主题聚焦于大中城市养老风险。大口径的养老风险范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寿风险：随着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预期寿命逐步延长。目前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左右，在部分大城市已超80岁，60岁后的生存余命超20年。退休生活周期延长，必然带来相应的生活消费和健康支出增长，个人将面临养老财富储备用尽或不足的风险。

二是健康风险：主要是指退休人员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超出已有储备的风险。健康是老年生活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为68.7岁，意味着退休后有十年以上的非健康状态生活期，对于医疗和照护等方面的需求将非常大，特别是越是高龄人员的大额健康支出会越高。

三是认知风险：个人养老储备不仅取决于已经积累的养老财富（充足度），也与未来的积累能力（稳定度）和积累意愿（认知度）有关。国内外经验表明，对于养老生活的认知水平、金融素养和行动意愿是决定养老财富储备是否充分的重要条件，大部分人在这些方面表现不足。

四是政策风险：主要是来自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延迟退休、养老金待遇调整以及福利调整等方面的政策变化，都会对个人退休保障产生影响。

五是市场风险：主要是指个人进行养老储蓄、投资理财时面临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从长期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调，债券利率下降，资本市场波动性较大，金融资产投资面临回报率下降的系统性风险。同时，房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到“以房养老”的可行性。

当然，老年退休生活还会面临其他各种风险，包括家庭风险、意外伤害损失等等。上述前三项风险为退休者个人面临的主要风险，后两项为宏观风险。本报告主要聚集于前三项风险，即老年人面临的养老金融资产缺口、健康支出超预期和养老认知不足三项，并基于生命周期财务安全的理论模型，重点对其中的养老财富储备风险进行模拟测算。

从现实情况看，造成养老财富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如下：

- 一是社保参加年限和缴费水平不足；
- 二是企业（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参与率低；
- 三是可用于养老的家庭金融资产储备不充分、不平衡，尤其对于健康医疗风险应对储备不足；
- 四是对养老风险的认知和准备不够，存在短视，缺乏储蓄、投资理财偏好和习惯等等。

02

养老财富 储备风险

(一) 养老财富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Pension Wealth Reserve Risk Index, 简称PWRRRI)指的是全国或(单个城市)典型个体在退休时点时面临的养老财富缺口,即退休时积累的养老资产权益与理想的退休收入替代率目标之间的差距(具体测算方法见附件二)。以下对十个大城市典型个体的重点调查数据和测算结果进行分项展示。

1. 总财富

测算结果显示,典型个体2038年退休时的养老财富储备总量为690万元,其中养老金总财富为243万元,占35.23%;金融资产为252万元,占36.60%;房产价值为194万元,占28.17%(图2-1)。其中养老金总财富和金融资产为全体调查样本的平均数据;房产价值为拥有第二套以上住房的调查者(占总样本的33.3%)的房产值分摊到全体样本数后的均值。在城市排名中,上海养老财富储备最高(913万元),其次为北京(811万元),再次为广州和深圳,说明一线城市养老财富总量较高;排名较为靠后的城市为成都、武汉、南京、石家庄等城市;苏州和佛山等新兴城市处于中游水平。在养老财富结构上,大部分城市的养老金财富与金融资产大致持平,略高于房产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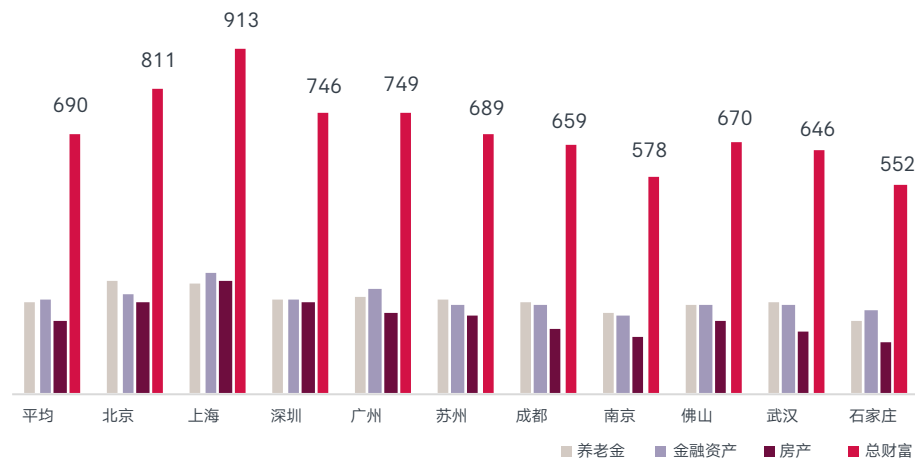


图2-1 调查群体养老财富储备情况(单位:万元)

2. 养老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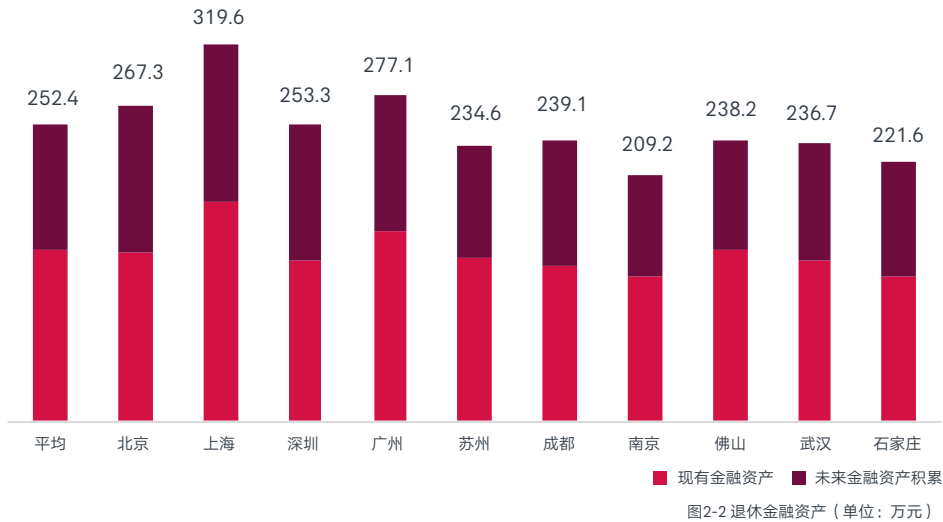
按三支柱养老金的参与情况分为四类人群，A类为仅参加社保、无年金和商保的群体，人数为3372人，占比为67.72%；B类为参加社保和企业年金、无商保的群体，人数为773人，占比为15.59%；C类为参加社保和商保、无年金的群体，人数为683人，占比为13.78%；D类为参加社保、年金和商保均参加的群体，人数为144人，占比仅为2.90%。经测算，A类群体养老金财富平均为216.4万元；B类为317.4万元，其中年金贡献为101.01万元，约占1/3；C类群体为263.1万元，商保贡献额为46.7万元；D类群体为三支柱养老金均参与的人员，总财富为368.1万元，来自社保、年金和商保的贡献率分别为58.79%、23.36%和17.85%（表2-1）。

表2-1分参保群体的养老金财富状况（单位：万元）

养老金总财富(万元)		平均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苏州	成都	南京	佛山	武汉	石家庄
A类	社会养老金	216.4	262.4	258.2	224.7	227.8	225.8	210.7	195.3	217.2	220.6	180.4
	企业年金	101.0	116.3	110.8	79.8	104.8	96.9	122.3	86.3	96.0	91.8	98.9
合计		317.4	378.8	369.0	304.5	332.6	322.7	333.0	281.6	313.2	312.5	279.3
C类	社会养老金	216.4	262.4	258.2	224.7	227.8	225.8	210.7	195.3	217.2	220.6	180.4
	商业养老保险	46.7	45.9	59.1	50.0	43.4	52.3	54.5	43.0	48.5	39.9	35.6
	合计	263.1	308.3	317.3	274.7	271.2	278.1	265.2	238.3	265.6	260.5	216.0
D类	社会养老金	216.4	262.4	258.2	224.7	227.8	225.8	210.7	195.3	217.2	220.6	180.4
	企业年金	86.0	84.4	80.5	97.2	73.7	112.6	106.1	69.2	73.3	67.3	117.1
	商业养老保险	65.7	42.5	46.8	69.0	71.0	73.2	28.4	42.7	66.3	59.6	57.1
	合计	368.1	389.4	385.5	390.9	372.5	411.6	345.1	307.2	356.8	347.5	354.6
各参保情况加权平均		243.0	297.6	294.7	250.9	255.9	248.1	243.6	218.2	237.3	245.7	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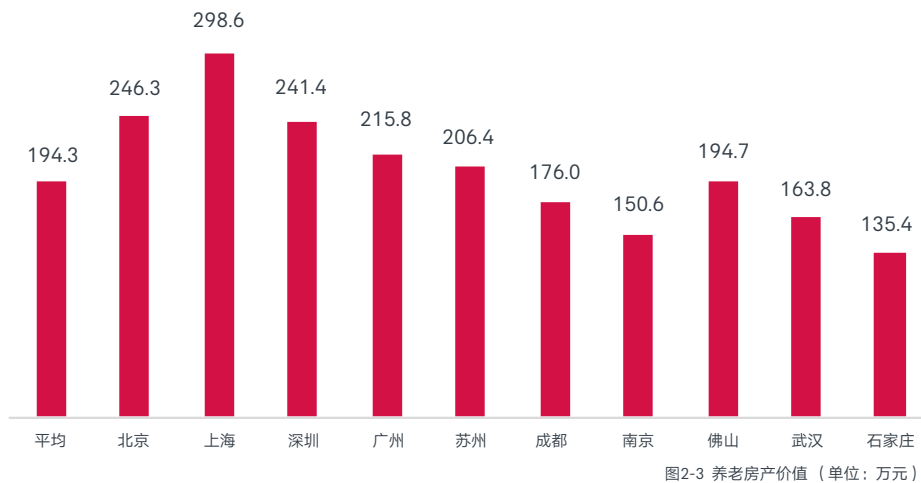
3. 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测算分为两项，一项是个人目前储蓄的家庭金融资产，全国平均为78.4万元，按国债利率指数计算折现到退休时点为145.1万元；另一类根据每年收入扣除支出后的净储蓄，计算出的退休时点资产积累额，为107.3万元，两项合计为252.4万元。金融资产最高的城市为上海319.6万元，其次为广州和北京；最低为南京、武汉和石家庄等城市（图2-2）。



4. 房产

测算假定家庭拥有的第二套及以上房产算作养老资产，调查数据表明10个城市拥有二套及以上房产的受访者占33.3%，房产市价平均为357.06万元，平均到全部样本后为118.9万元，折现到60岁为194.3万元（图2-3）。



(二) 退休收入替代率

调查样本个体的年平均收入为19.73万元，最高的为上海23.58万元，最低为南京16.75万元。在调查样本中，低位收入1/3群体的年均收入为7.76万元；高位收入1/3群体为36.64万元，接近平均收入者的2倍和低位收入者的5倍。在17年后退休时，受访者的测算年均收入为39.23万元，相比2021年增长近一倍，年均增速为4.39%。到2038年，10个城市的社会平均工资为26.12万元，年均增速为6.73%（表2-2）。之所以受访者年均收入增速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主要原因在于受访者平均年龄高于43岁，随着年龄接近退休，收入增速会相对下降。

表2-2 调查群体目前和未来的收入水平

年均收入（万元）	平均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苏州	成都	南京	佛山	武汉	石家庄
当前平均收入 (代表中等1/3群体)	19.73	20.93	23.58	20.34	21.12	18.96	19.07	16.75	18.62	18.73	18.16
低位收入1/3群体	7.76	7.77	7.79	7.80	7.76	7.75	7.88	7.78	7.69	7.72	7.71
高位收入1/3群体	36.64	37.40	37.03	37.85	36.64	35.70	37.05	35.54	35.89	35.80	36.43
测算退休前的个人 平均收入	39.23	43.93	45.23	41.68	40.75	37.71	39.22	33.31	37.03	39.22	36.12
测算退休前的社会 平均工资	26.12	35.01	29.25	29.25	27.45	23.83	22.47	23.83	28.34	24.26	20.93

退休收入替代率指的是个人退休后第一年收入相对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例（详细计算方法请参见附件二），该指标衡量的是个人退休前后收入水平的变化，是国际上衡量退休收入充分性的惯用指标。从测算结果看，2038年全体样本退休收入个人工资总替代率为89%，其中养老金收入替代率为39.5%，金融资产（折算）收入替代率为28%，房产（折算）收入替代率为21.5%（图2-4）。虽然总体算，退休后三项收入能维持退休前收入的90%左右；但如果除去房产，该指标下降为67.5%，达不到国际上常讲的70%标准。在各个城市的对比上，替代率水平差距并不大，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相对高一些，武汉、石家庄、南京等城市替代率水平相对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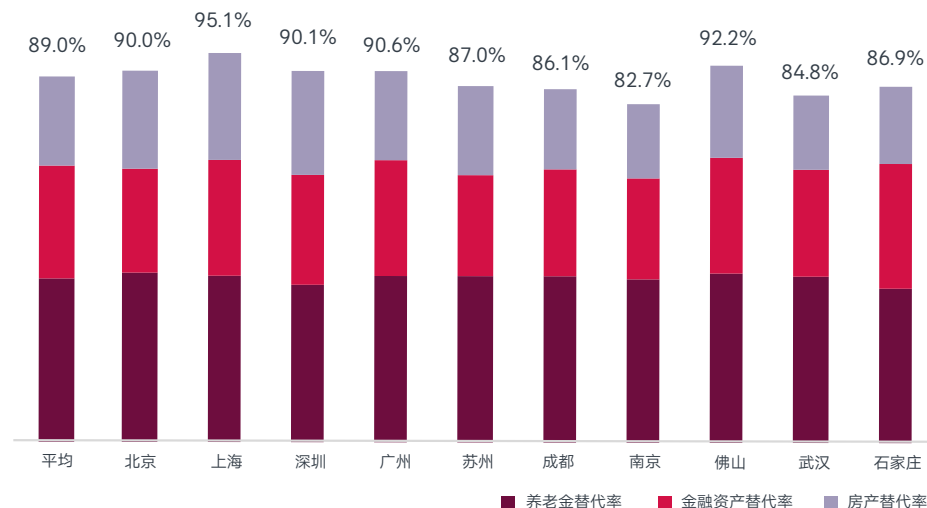


图2-4 退休收入替代率（相对个人退休前工资）

(三) 风险指数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PWRRI）指的退休收入个人工资替代率与目标值之间的差距（详细计算方法请见附件二）。关于理想的退休收入目标替代率，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仅就养老金收入而言，目前OECD国家三支柱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为52%左右；国际劳工组织在《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中提出的养老金最低替代率目标为45%，建议水平为55%；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社保制度时，曾提出基本养老金替代率目标达到58.5%左右。从实际情况看，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群体，目标替代率的要求也不一样：通常低位收入群体会高一些，高位收入群体会低一些。例如，2019年美国波士顿退休研究中心（CRR）在一份关于退休风险指数测算报告中提出，在美国按三分位收入群体划分，低位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位收入者的目标替代率分别为81%、72%和67%；值得指出的是，该报告将养老金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折算）收入和不动产（折算）收入都纳入了退休收入范畴之内。本次调查问卷显示，69.7%的受访者认为退休后合意的收入水平应为退休前收入的40%-60%之间。参考国内外经验和本次调查数据，本报告中设定的退休收入理想目标替代率见（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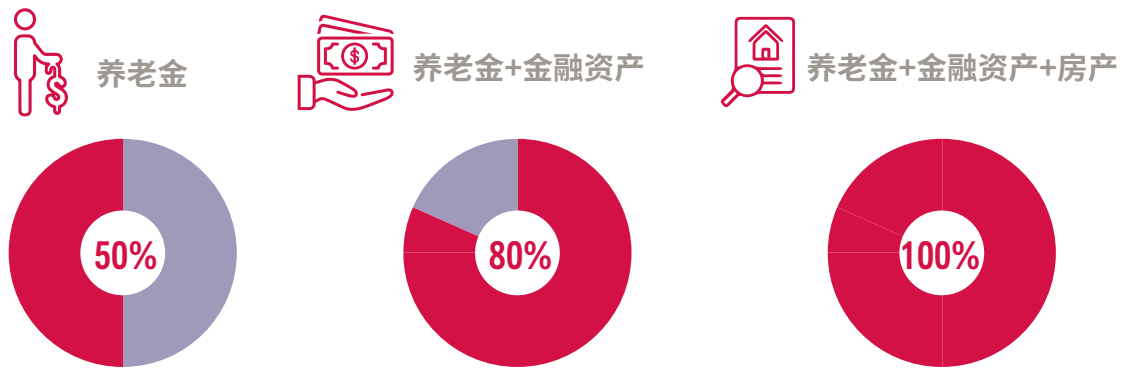


图2-5 退休收入的合意目标替代率设定

经测算，平均收入典型个体的养老金风险指数为21.01%，养老金与金融资产合计后的风险指数为15.67%，养老金、金融资产与房产三项合计后的风险指数为11.01%。这说明从养老金收入角度分析，受访者有21%的收入缺口，加入金融资产后下降到15%左右，再加入房产后下降到11%（图2-6）。从分城市情况看，南京、武汉、石家庄的风险指数相对较高，均在13%以上；上海、深圳、广州、佛山四城市相对较低，均在10%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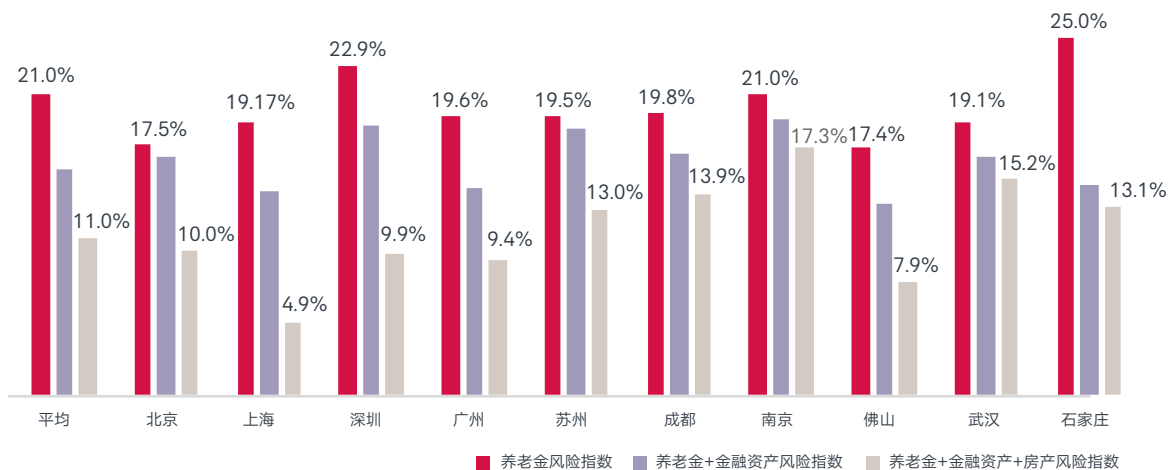


图2-6 平均收入典型个体风险指数

(四) 敏感性分析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的测算过程涉及到各项参数及其假设，比较重要的参数有社保缴费密度、企业（职业）年金或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率、金融存款储蓄率等指标。以下将主要参数变化对养老财富储备风险的影响，做出敏感性分析。

1. 社保缴费密度

缴费密度指的是参加社保实际缴费年限相对于工作生涯的比重，反映个体实际参保缴费的情况。根据调查数据，调查样本平均年龄为43.4岁，参保起始年龄平均为29.1岁，已参保时长为14.3年，缴费密度为79.5%，至退休未来参保年限为16.6年（表2-3）。

表2-3 调查样本参加社保基本信息

参保基本信息	平均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苏州	成都	南京	佛山	武汉	石家庄
年龄	43.4	43.5	43.3	43.4	43.4	43.5	43.2	43.3	43.6	43.2	43.5
已参保时长(年)	14.3	14.1	14.6	14.5	13.8	14.3	15	14.4	14.1	13.8	14.7
未来参保时长(年)	16.6	16.5	16.7	16.7	16.6	16.5	16.8	16.7	16.4	16.8	16.5
参保起始年龄	29.1	29.4	28.7	28.9	29.6	29.2	28.2	28.9	29.5	29.4	28.8
缴费密度	79.5%	79.3%	79.6%	77.1%	81.6%	82.9%	78.0%	79.0%	81.4%	82.0%	80.7%

缴费密度的变化会通过社保缴费年限、个人账户缴费额积累等因素影响到未来领取的社会养老金待遇水平。测算结果表明，缴费密度增加1%，退休首年养老金领取额增加1740元；养老金替代率上升0.5个百分点（图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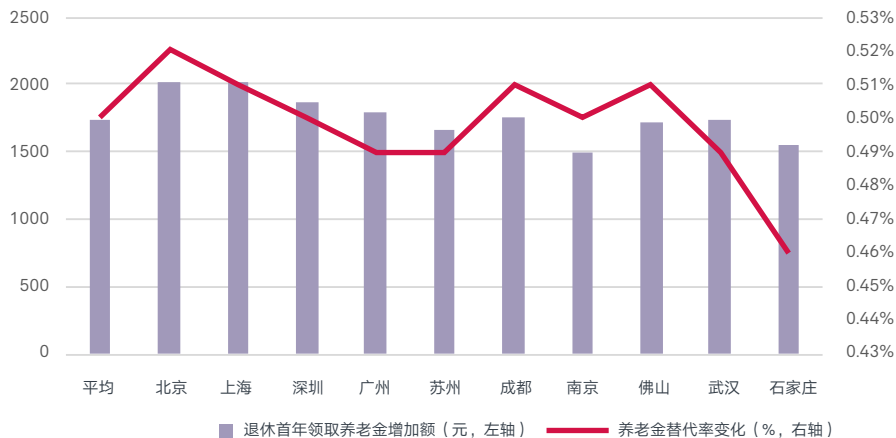


图2-7 社保缴费密度敏感性分析

2. 年金 & 商保参与率

年金、商保参与率指的是参加年金计划或者商业保险的人数比例。从分人群参保情况的调查数据看，参加企业（职业）年金计划的人员占比为15.6%，购买商保的比例为13.8%，而三项保障计划都参与的人群仅占2.9%（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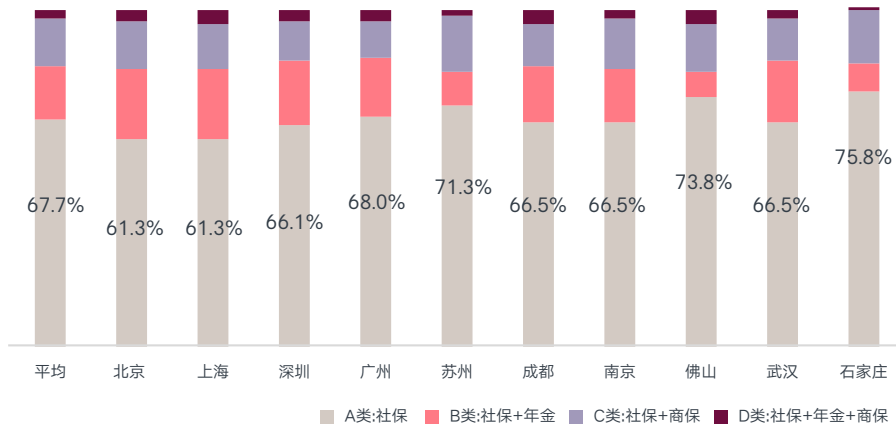


图2-8 调查样本中分类参保情况（各类人员占全部样本人员比重）

测算结果得出，假定年金和商保计划参与率（参与人数/全体样本）都增加1%，养老金总财富增加2.97万，典型个体首年领取养老金增加1913元，养老金替代率上升0.4个百分点（表2-4）。

表2-4 年金&商保参与率敏感性分析

	平均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苏州	成都	南京	佛山	武汉	石家庄
养老金总财富变化(万元)	2.97	2.96	2.93	3.35	3.11	2.41	2.84	2.59	3.09	2.97	2.96
首年领取养老金变化(元)	1913	1797	1799	1890	1820	2028	1988	1460	1815	1652	2169
养老金替代率变化	0.40%	0.45%	0.45%	0.54%	0.51%	0.44%	0.49%	0.42%	0.60%	0.40%	0.45%

3. 储蓄率

储蓄率指的是个体年净收入（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养老储蓄的比例。储蓄率提高会增加家庭金融资产规模，从而提升退休收入。根据调查数据，2021年典型个体税后年收入中约有21.6%的比例用于储蓄（投资理财），大致相当于净收入的44%左右，计算出的年储蓄额为4.5万元。根据模拟测算结果，个人净收入储蓄率上升1个百分点，退休后金融资产增加值为2.6万元，金融资产退休收入替代率上升0.27个百分点（表2-5）。

表2-5 储蓄率敏感性分析

	平均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苏州	成都	南京	佛山	武汉	石家庄
调查年收入中 储蓄部分占比	21.6%	22.9%	22.0%	21.6%	21.9%	21.4%	21.8%	20.3%	21.6%	20.7%	21.5%
年储蓄额	4.5	5.0	5.7	4.8	4.9	4.1	4.4	3.6	4.0	4.1	4.2
储蓄率上升1%退休后 金融资产增加值(万元)	2.4	2.7	3.0	2.6	2.6	2.1	2.4	1.9	2.1	2.2	2.2
储蓄率增加1%退休后 金融资产替代率变化	0.27%	0.26%	0.27%	0.27%	0.26%	0.23%	0.26%	0.23%	0.24%	0.25%	0.31%



03 健康保障 风险

(一) 医疗保险现状

1. 参加国家医疗保险的情况

国家医疗保障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公费医疗保障三部分组成，其中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合计参保人数超过13.6亿人，参保率在95%以上。受访者中有98.9%自报已参加国家医疗保障，参保情况好于全国水平（图3-1）。参加上述三种国家医疗保障的依次占比59.8%、32.7%、6.4%，有1.1%的受访者没有参加任何国家医疗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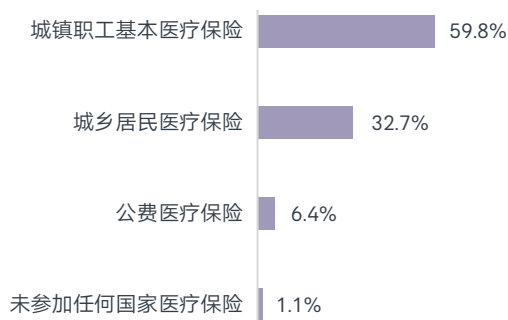


图3-1 参加国家医疗保险的比例

在各种经济类型中（图3-2），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合资企业受访者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较高，分别占87.5%、78.1%、76.4%，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相当，分别是64.4%和63.4%，社会组织等其他经济类型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最低，只有32.4%。

近年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力度和报销比例不断提高，制度吸引力增强。国有企业受访者中有36.6%参加居民医疗保险，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分别有42.3%和34.2%参加居民医疗保险。需要注意的是，仍有5.4%的个体就业者没有参加任何国家医疗保险，反映出医保扩面仍需加强，针对灵活就业和个体就业的工作特征，改善社保办理流程，增强医保参保便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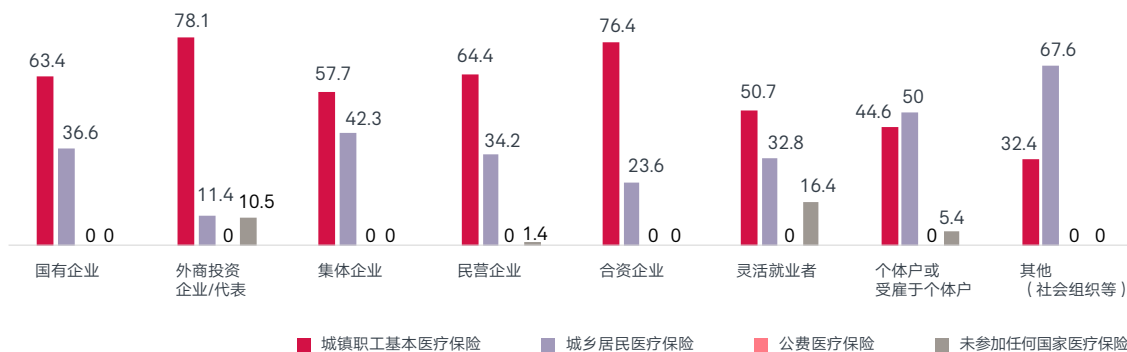


图3-2 各种经济类型医疗保险参保率(%)

2. 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情况

商业健康保险是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医疗保险的必要补充。2020年，职工医疗保险住院均次费用为12657元，居民医疗保险次均住院费用为7546元，医保基金对政策范围内费用的报销比例分别约为85%和70%，政策范围之外的费用均须个人自付，如遇大病、特病、慢病，家庭医疗负担仍会很重。

从调研情况看（图3-3），个人投保商业健康保险的比例并不高。受访者中只有5.5%、7.4%、8.0%的人分别参加健康意外险、重大疾病险、长期护理险，有53.2%未购买任何形式的商业健康保险。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具有相互保险特征的网络互助，以及由政府背书、具有普惠性质的城市定制型补充医疗保险（又称“惠民保”），因为投保门槛低，保障水平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和参与。调查显示，20.8%的受访者购买了“互联网性质的相互保险”，22.9%的受访者购买了“政府普惠保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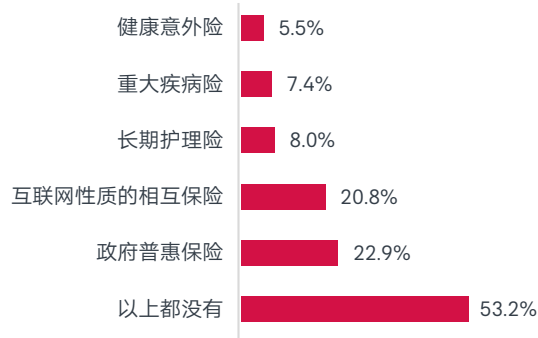


图3-3 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比例

从城市分布看（表3-1），十个受访城市中，石家庄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比例最高，为63.4%，上海最低，为39.1%，各地之间的差异与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成熟度有关。从参加“政府普惠保险”情况看，上海受访者的参与比例最高，为32.7%，石家庄最低，为17.5%。城市之间投保率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是各地推出“惠民保”的进度有先后，推广力度也有不同。深圳和上海的受访者中分别有11.8%和12.8%的人购买了“长期护理保险”，购买比例明显比其他城市高，这与两地注重推进商业健康险有很大关系，上海是税优健康险的试点城市，深圳是最早放开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购买商业健康险的城市。

表3-1 分地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情况（%）

选项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苏州	成都	南京	佛山	武汉	石家庄
健康意外险	5.7	8.3	7.0	5.4	5.8	4.8	4.0	7.3	3.7	3.3
重大疾病险	7.5	10.7	9.4	9.3	7.4	5.8	6.6	7.9	5.0	4.7
长期护理险	7.3	12.8	11.8	9.5	5.8	6.2	6.6	7.5	6.7	6.1
互联网性质的相互保险	20.8	24.3	26.2	19.9	20.6	14.4	19.6	23.4	14.3	16.7
政府普惠保险	22.6	32.7	21.4	20.7	22.8	21.6	21.2	27.4	21.0	17.5
以上都没有	54.7	39.1	47.6	52.9	52.4	59.8	57.0	46.7	58.6	63.4

尽管受访者对退休后生大病有很多担忧，但为此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表3-2）。55-59岁受访者中有9.7%购买重大疾病险，较其他年龄组略高一些，但总体上各年龄段差别不大；对于政府背书的普惠保险，未婚者和无子女者的购买比例分别为11.8%和17.0%，显著低于已婚者的22.8%、离婚或丧偶者的27.4%和有子女者的23.1%，反映出未婚者和无子女者对自身健康保障的重视度仍不够。

表3-2 分年龄和家庭结构参加商业健康保险情况（%）

选项	35-39岁	40-44岁	45-49岁	50-54岁	55-59岁	已婚(含再婚)	离婚或丧偶	未婚	无子女	有子女
健康意外险	6.0	5.2	5.3	6.4	5.2	5.6	3.4	8.8	6.3	5.5
重大疾病险	7.2	7.3	7.9	4.6	9.7	7.6	4.1	0.0	7.1	7.5
长期护理险	7.6	8.2	7.3	10.4	8.9	8.0	7.5	14.7	8.0	8.0
互联网性质的相互保险	21.1	19.1	19.5	21.6	20.5	20.0	19.2	26.5	17.0	20.0
政府普惠保险	21.7	24.0	22.6	22.1	23.8	22.8	27.4	11.8	17.0	23.1
以上都没有	52.6	53.9	53.4	54.5	50.5	53.2	52.1	55.9	56.3	53.1

(二) 健康风险的认知

1. 对退休后医疗费用负担的预期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疾病、失能等风险逐渐加大，加上子女离巢，人们对退休后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担心。受访者最担心退休后发生的三项风险依次是“医疗负担太重”、“长期护理负担太重”和“生活费用超支”，分别占受访者的66.9%、63.7%和49.3%。孤独是人们对老年生活的普遍担忧，有44.4%的受访者将“无人陪伴”列入最担心退休后遇到的三项风险之一。此外，大约每7个受访者中有1人担心“养老金被子女占用”（图3-4）。人们对退休后生活最多的担忧是来自与健康相关的风险，需要在健康保障方面予以提早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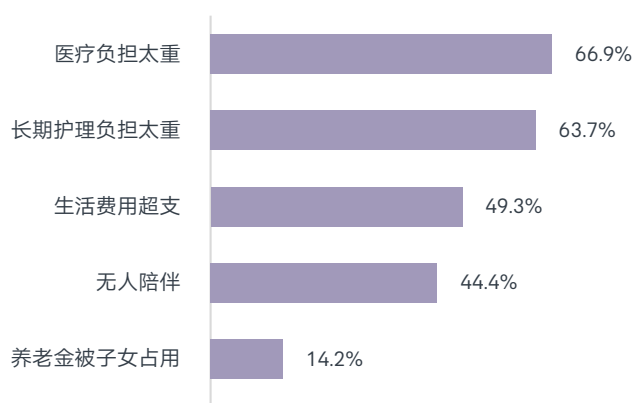


图3-4 最担心退休后遇到的三项风险

从选择次序来看，41.6%的受访者将“医疗负担太重”最为首选项；分别有25.3%和19.3%的受访者将“生活费用超支”和“长期护理负担太重”作为首选项（图3-5）。长期护理是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时的需求，将“长期护理负担太重”列在“生活费用超支”之后，反映出受访者虽担心退休后发生失能风险，但对其可能带来的照护和经济压力预判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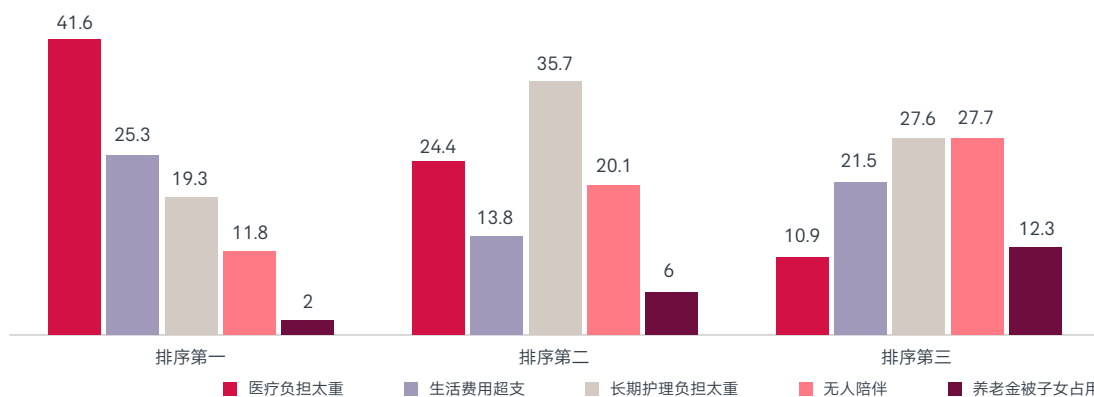


图3-5 最担心退休后遇到的三项风险选择 (%)

医疗费用是退休后生活支出最重要的一项。在各项医疗费用支出中，74.5%的受访者为退休后“大病”的费用表示担忧，分别有70.0%和57.0%的受访者为“慢病”或“护理”的费用表示担忧（图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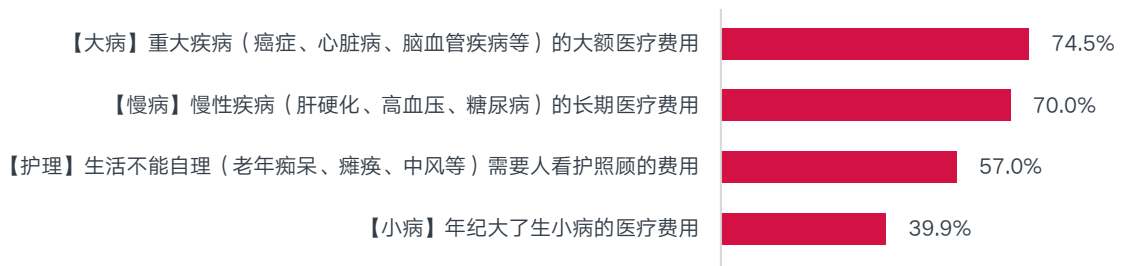


图3-6 担心退休后发生医疗费用的类型

受访者中有58.7%将“大病”医疗费用作为首选项，其次是“慢病”，占19.1%（图3-7）。这反映出大多数人普遍认为重大疾病会增加其退休后生活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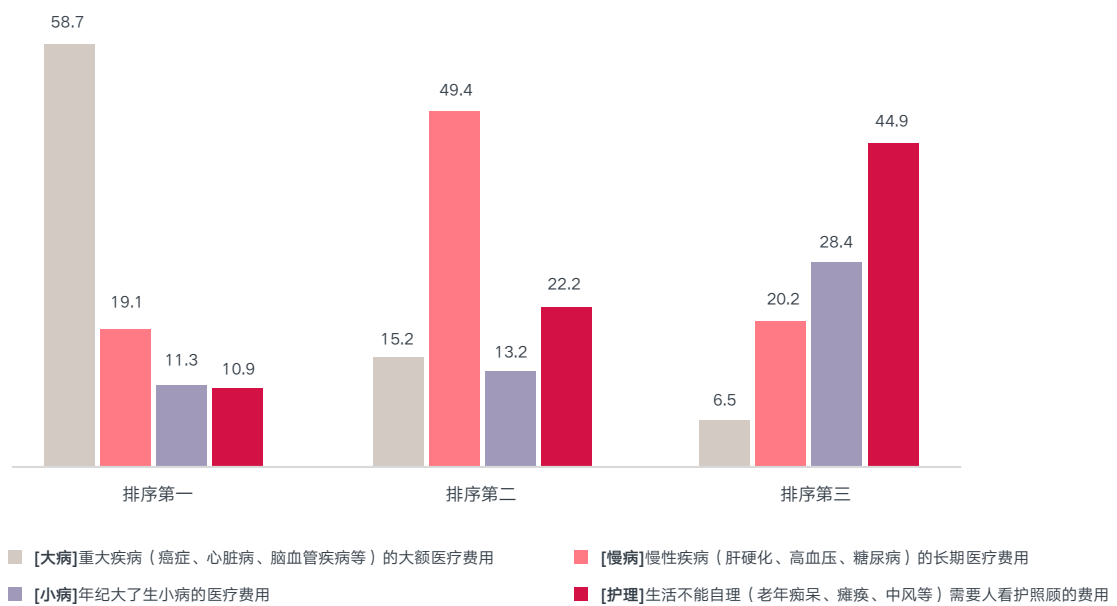


图3-7 担心退休后发生医疗费用的次序选择 (%)

2. 对半自理或完全失能情况下的保障预期

在被问及身体若处于半自理状态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时，受访者中有62.3%选择“医疗服务保障（医院）”，分别有56.8%和53.0%选择“护理服务（机构）”和“经济保障”；在被问及若身体处于完全失能状态最关心的三个问题时，受访者中有65.0%选择“医疗服务保障（医院）”，分别有60.1%和51.2%的人选择“护理服务（机构）”和“经济保障”（图3-8）。只有19.5%的受访者将“照护服务（社区）”作为半自理时照护服务的选择项，反映出我国社区养老和照护服务发展滞后，认可度较低。总体上看，人们对身体处于半自理和完全失能状态下所关注的问题相近，大多数人都是期望解决好医疗护理、专业机构护理和经济保障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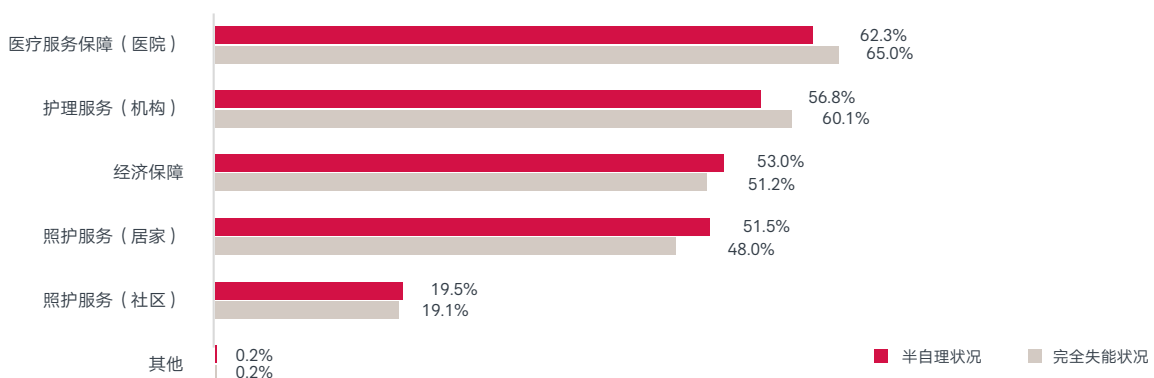


图3-8 身体处于半自理或完全失能状态下最关心的三项

尽管在半自理和完全失能两种情况下，三个选择中“经济保障”的占比都最低，但作为首选项却是最高。分别有37.3%和34.7%的受访者将“经济保障”作为半自理和完全失能状态下最关心问题的首选项，其次是“护理服务（机构）”；尽管“医疗服务保障（医院）”是选择最多的选项，但只有21.6%和20.7%的受访者将其作为两种身体状态下最关心问题的首选项（图3-9）。上述结果反映出人们对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时的心态，希望医院或专业机构能够在需要时提供及时的照护服务，但更希望经济自由度高一些，能够选择更好的专业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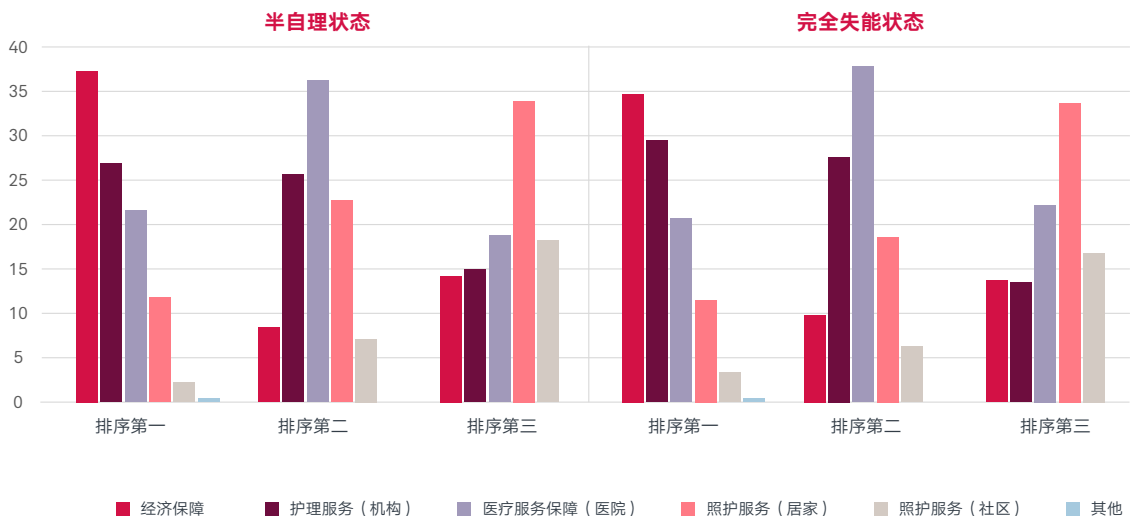


图3-9 身体处于半自理和完全失能状态下最关心的三个问题选择（%）

(三) 健康支出的准备

将生活支出和健康支出分别进行专项准备，有助于缓解年老体衰时医疗支出对退休生活造成的影响，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有必要这样做，37.6%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有必要”，43.8%认为“比较有必要”（图3-10）。上述结果反映出人们对健康准备的认可度较高，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要为退休后健康保障提前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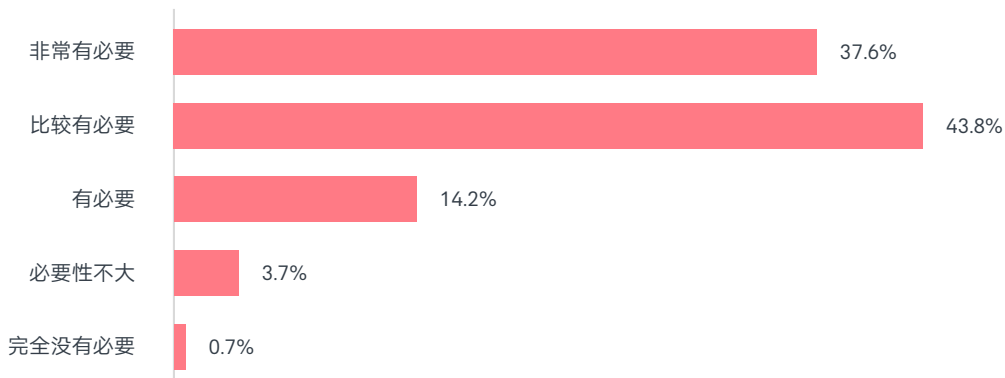


图3-10 将退休后生活支出与健康支出分开进行专项准备的必要性

分学历情况看，高中学历受访者选择“非常有必要”的比例是40.3%，明显高于其他学历，这可能是与高中学历的职工医保参保率不高，医保的保障度有限，以及可能从事健康风险较大的工作等有关。分家庭结构和子女数情况看，未婚受访者中有55.9%、无子女受访者中有41.1%认为“非常有必要”，显著高于已婚、离异或丧偶以及有子女的受访者，反映出这些人依靠自己为退休生活多做准备的意识更强（图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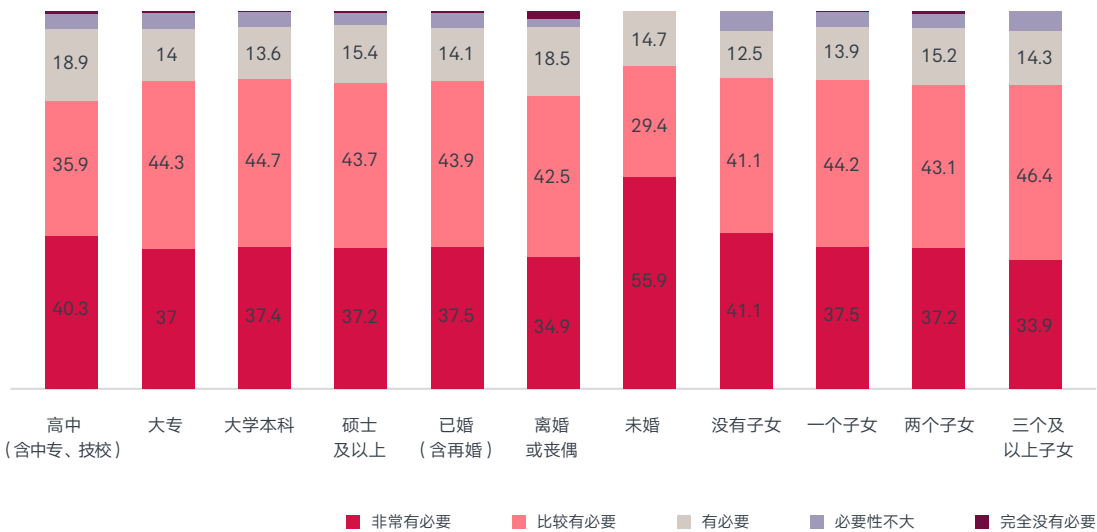


图3-11 将退休后生活支出与健康支出分开进行专项准备的必要性（分类回答）（%）

对健康保障的准备上，除了国家举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以外，还有商业健康保险作为补充，自有资金也会分流出来一部分用于医疗需求。但从这三方面的准备上，受访者普遍不乐观。在社会医疗保险方面，38.0%的受访者认为医保只能满足退休后20%~40%的医疗支出，40.7%的受访者认为能够满足40%~60%的医疗支出，只有1.8%的人认为能够满足80%以上的医疗支出（图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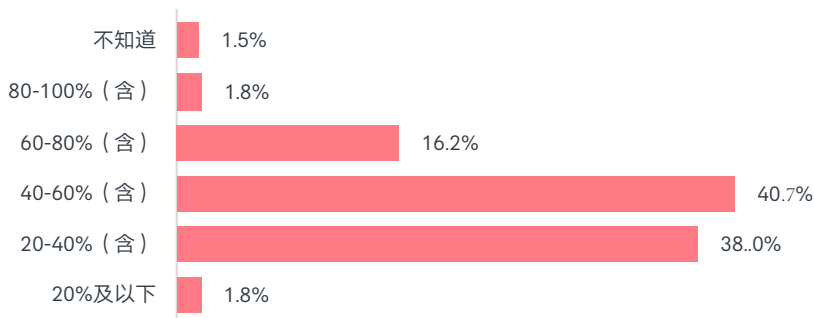


图3-12 社会医疗保险满足退休后医疗支出的预期

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没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在已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人中，自报保额在10万元以下的占63.4%（图3-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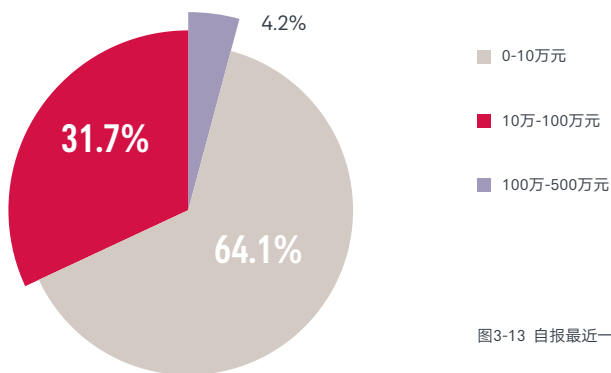


图3-13 自报最近一年商业健康险保额分布

在自有资金准备上，受访者中分别有36.2%和41.8%的人认为现有资金储备只能满足全养老阶段医疗需求的“20%~40%”和“40%~60%”，只有5.1%的认为能够满足“80%以上”（图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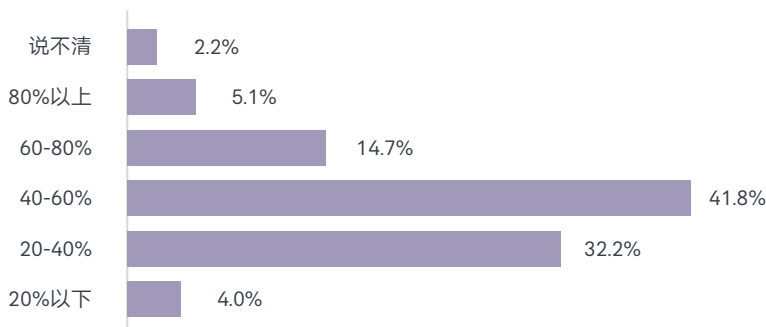


图3-14 现有现金储备能够满足全养老阶段医疗需求的预期

(四) 健康保障方式的预期

1. 理想康养模式的选择

当前各地推行“9073”或“9064”的康养模式，其中90%的人居家养老，7%（6%）和3%（4%）的人由社区养老或机构养老。但当发生失能或半失能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专业的康养服务机构。在退休后的健康保障方式选择上，45.5%的受访者将“居家养老（专业服务人员上门提供照料）”作为理想的康养模式上，另外有30.1%和22.2%的人选择“养老院养老（由养老机构提供全天候照料、生活护理和精神慰藉）”和“社区养老（专业养老机构进社区）”（图3-15）。上述结果显示，尽管选择居家养老的人最多，但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会选择养老院养老，反映出人们对老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时更倾向专业照护的意愿，这就对加快建设高质量康养服务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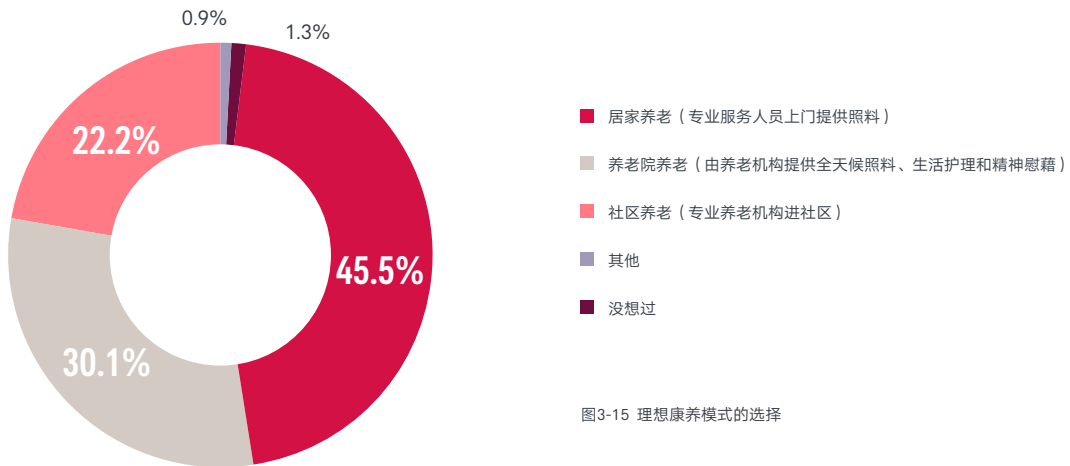


图3-15 理想康养模式的选择

分地区看，广州有48.1%的人将居家养老作为理想康养模式，在各地最高，比最低的苏州高约6个百分点；佛山有32.1%的人将养老院养老作为理想康养模式，比最低的深圳高5个多百分点；苏州有25.0%的人将社区养老作为理想康养模式，较最低的上海高4.5个百分点（图3-16）。理想康养模式的偏好存在城市间差异，反映出家庭亚文化和各地康养服务市场发展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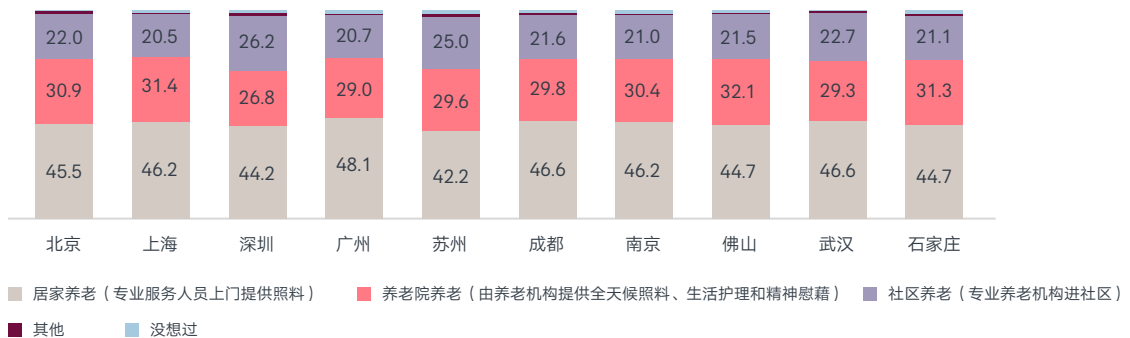


图3-16 分地区理想康养模式的选择（%）

灵活就业者、个体就业者、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受访者均将居家养老作为理想康养模式，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经济类型和学历受访者，反映出这部分群体在养老储备上仍显乏力，对专业照护不敢奢望。在将社区养老作为理想康养模式的受访者中，灵活就业者、个体就业者选择此项的比例分别是13.4%和17.8%，比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低5~10个百分点（图3-17），反映出灵活就业者、个体就业者的社区融入度低，折射出社区建设中仍存在空白点，应更加关注这部分群体的社区融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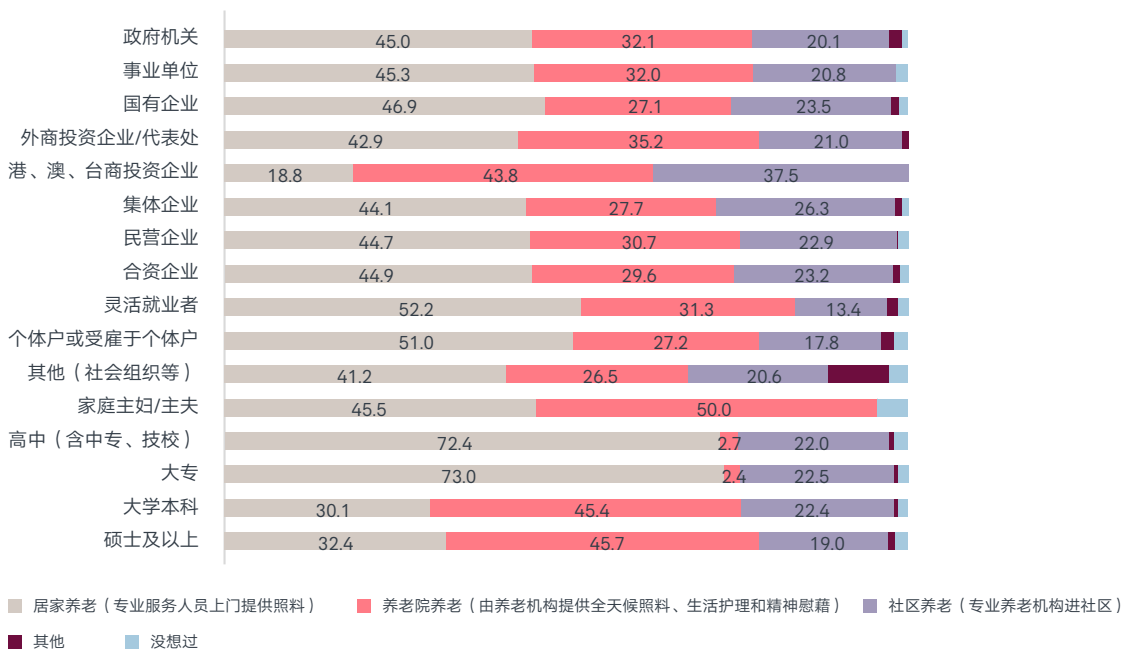


图3-17 分经济类型、学历和家庭类型的理想康养模式的选择 (%)

2. 为健康保障增加准备的意愿

为了达到理想的退休状态，50.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在健康管理方面为自己和家人投入更多，40.7%表示“比较愿意”，只有0.4%的表示“不太愿意”，反映出人们对自身和家人退休后保持健康非常重视，增加投入的意愿较高（图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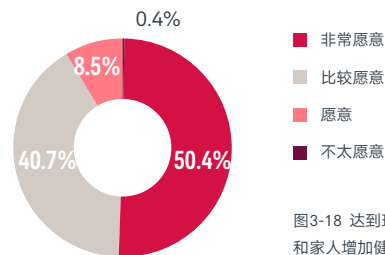


图3-18 达到理想退休状态为自己和家人增加健康投入的意愿

在表示“非常愿意”的受访者中，分别有11.5%和10.6%选择增加投入15%~20%或20%以上，表示“比较愿意”的受访者中，分别有10.4%和2.2%选择增加15%~20%或20%以上，表示“愿意”的受访者中，有8.0%选择增加15%~20%（图3-19）。上述结果反映出人们为自己和家人健康增加投入能够接受的幅度，也折射出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力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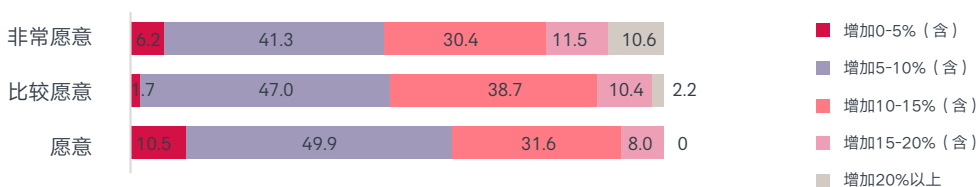


图3-19 不同意愿强度下愿为自己和家人增加健康投入的幅度 (%)

04 养老规划 认知风险

(一) 退休生活信心和预期

1. 退休后生活状况的认知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平衡压力将越来越大，未来很可能将有一部分人无法如期“退休”，或者说即使领取了养老金，但因为缴费基数过低或缴费年限过短，养老金待遇水平未必能完全覆盖晚年的生活开支，因此将不得不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同时，对于退休后是否继续工作的不同回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自我养老储备的态度和行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中16.7%表示退休后继续工作是完全有必要的，回答有一定必要的受访者占比为32.4%，认为可能有这个必要的高达35.6%，支持不太必要的和完全不必要的分别仅占11.8%和2.3%。可见，大多数人对退休后继续工作这一问题给予比较清醒和谨慎的认知（图4-1）。另外，这种认知水平并没有随着职业、年龄、收入和性别等因素表现出趋势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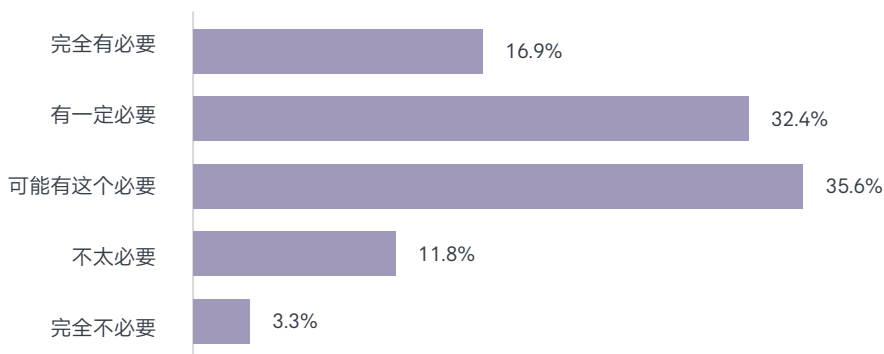


图4-1 对退休后继续工作的预期

退休后由谁来照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调查显示，预计由子女照顾的比例最高，为30.8%，而选择养老机构照顾、由配偶照顾和自己照顾自己也分别高达21.4%、21.3%和19.3%，而选择由保姆或亲戚朋友的比例很低（图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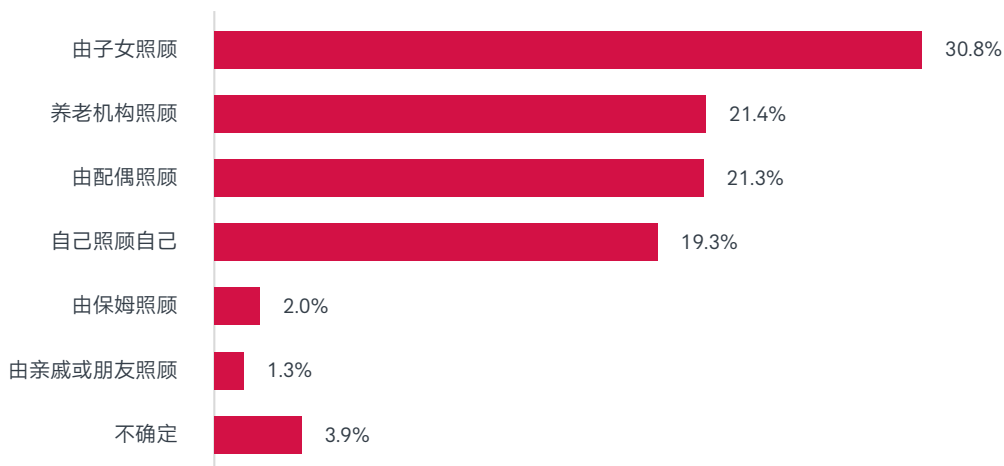


图4-2 对退休后受照料情况的预期

调查显示，作为第一选择，人们对未来退休养老阶段的需求支出为日常消费支出，占比高达51.6%；随后是医疗支出、护理支出和子女相关支出，占比依次为24.0%、10.9%和8.7%。在第二选择中，选择最高的是医疗支出，占比为38.1%；其次是护理支出、子女相关支出和生活品质支出，占比依次为19.9%、12.6%和9.4%。在第三选择中，选择最多的为生活品质支出，占比为28.5%，而其他各项较为均衡（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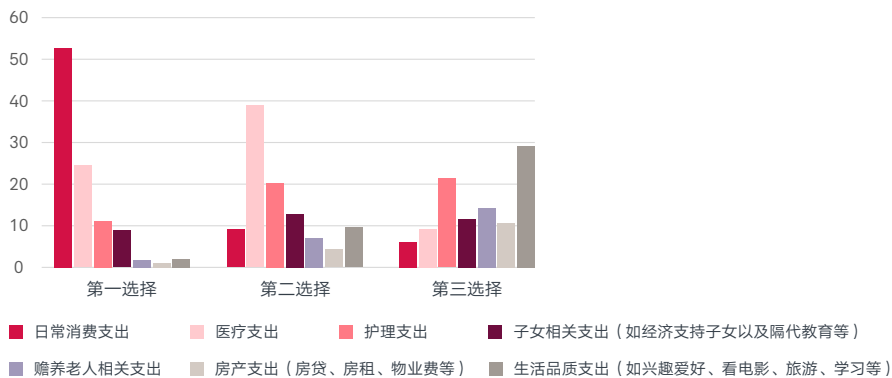


图4-3 未来退休养老阶段的需求支出预期 (%)

2. 对合意退休收入的认知

一般来说，因为劳动收入的缺失或部分缺失，退休后收入要低于退休前收入，同时个人或家庭消费需求（特别是一些刚性需求）也会随之降低，但为了保证生活品质不降低，所以退休后收入要维持在一定比例之上。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退休后合意的收入占目前收入的比例应保持在40%-60%之间，占全部受访者的69.7%；其次是认为维持60%以上，占比为26.2%，只有4%的人认为可以维持在40%及以下。考虑到目前调查人员社会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仅为40%左右，这说明至少为了达到人们合意的退休收入水平，还需要其他收入来源给予补充（图4-4）。另外，在职期间收入越高，退休后合意替代率水平应该越低，这符合理论也符合国际惯例，但调查并没有显示出人们对这一规律有清晰和正确的认识，即随着在职收入的增加，退休后收入的合意替代率并没有下降（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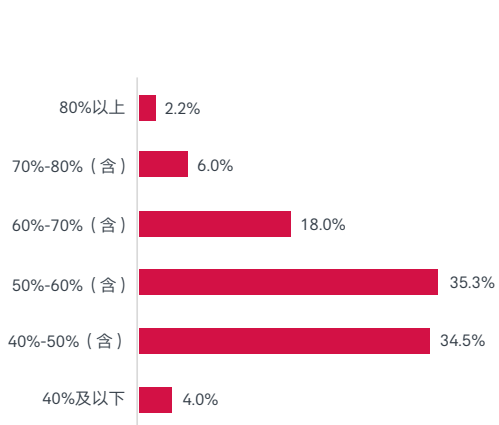


图4-4 退休后收入占目前收入的合意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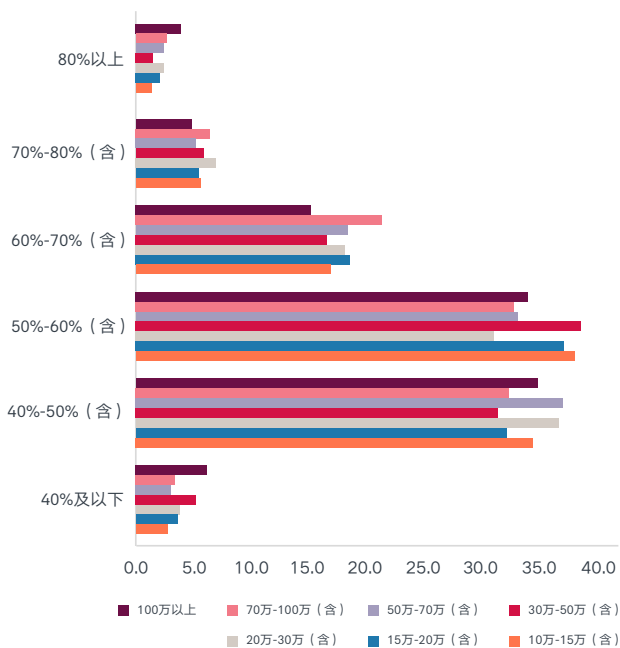


图4-5 年龄与定期储蓄偏好的关系 (%)

从结构上来说，退休后收入可以有多重来源，包括却不限于养老金，人们会基于一定判断做出预期。调查显示，作为第一选择，预期收入来源排在第一的是养老金收入，占比59.8%；然后依次是企业/职业年金收入、商业养老保险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相应占比为16.9%、13.1%和6.7%，而其他选项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第二选择，选择企业/职业年金收入、商业养老保险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比重较高，均高于20%。最后，对于第三选择，人们更倾向于商业养老保险收入和资产性收入；需要强调的是，劳动收入和子女亲友馈赠收入在第三项选择中占比也较高（图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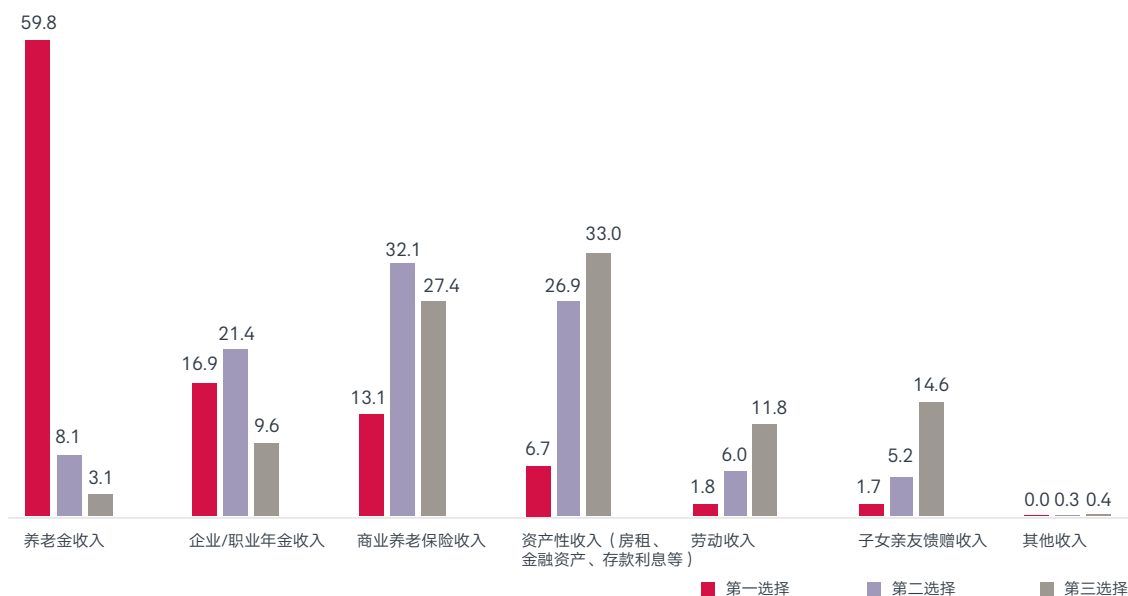


图4-6 预期退休后主要的收入来源 (%)

3. 对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程度的认知

从多支柱角度考虑，退休后收入应该包括不同层次的养老金收入，即包括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也应该包括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在所有养老金收入中占比应该处于一个合理区间。调查显示，受访者希望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所占比例为50%左右的最多，占到31.1%；其次是选择40%左右，占比为26.4%；再次是选择60%左右，占比15.1%，而其他选项都低于10%（图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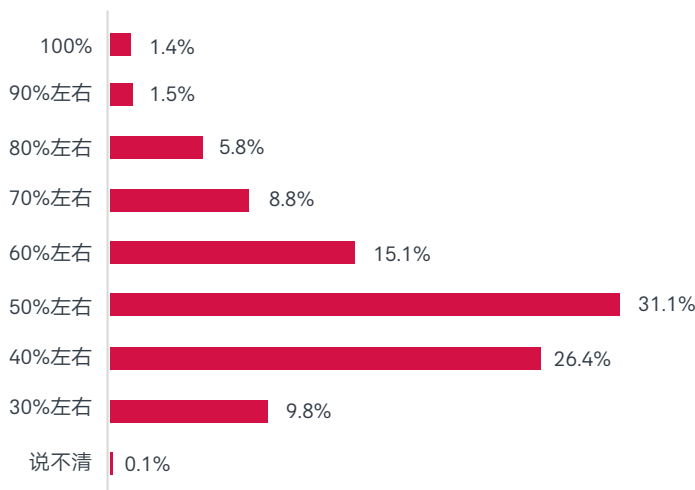


图4-7 所有养老金中基本养老保险占比期望情况

4. 对养老相关保险产品的认知

为了应对退休后各种不确定，理性且有经济能力的个人都应该看看购买适合自己或家庭需求的保险产品，但前提是要对这些产品要有一定了解。人们对商业健康保险非常熟悉，选择非常了解的为21.6%，选择比较了解的更是高达48.4%，选择听说过的为23.3%，相比之下选择不了解或非常不了解的人数非常有限（图4-8）。最后，人们对长期护理保险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需求和意愿（图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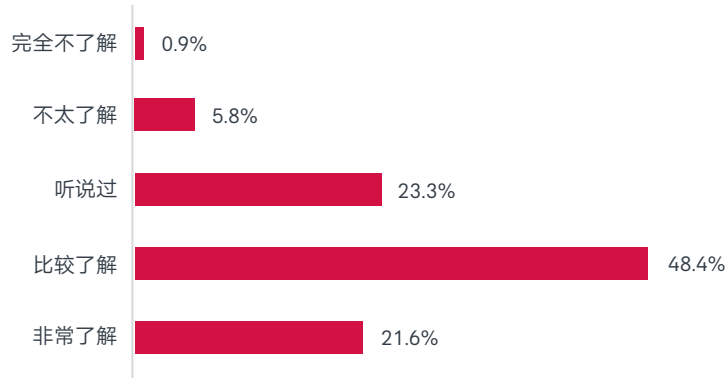


图4-8 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了解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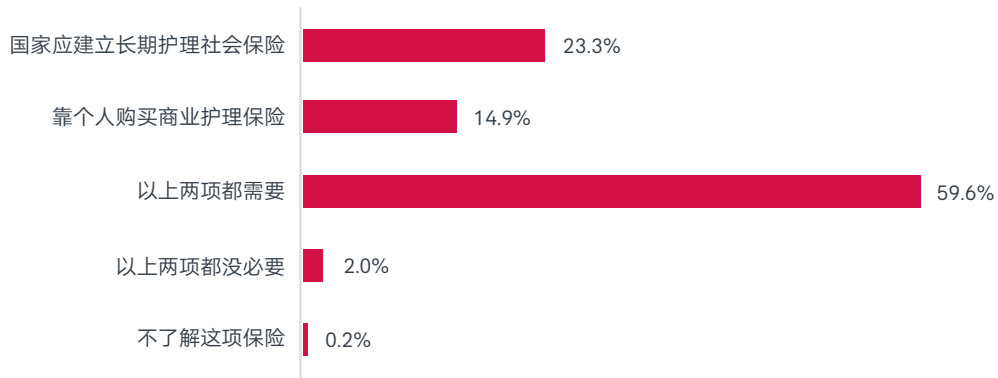


图4-9 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看法

(二) 养老理财偏好和规划

1. 定期理财偏好

对于定期储蓄或理财的处理态度，反映了人们自我保障的意识和行为，是决定养老理财偏好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就有定期储蓄的习惯，高达99.3%。只是程度上分化明显，大部分时间定期储蓄的占比最高，也仅为30%；一直定期储蓄和偶尔定期储蓄均为24.2%（图4-10）。如果将选择“一直是这样”和“大部分时间是这样”两个选项合并，并将其界定为具有较强的定期储蓄偏好，可以得出超过半数（54.2%）的受访者具有较强的定期储蓄偏好。进一步通过交叉分析可看到，定期储蓄偏好与年龄、学历和收入具有大体上的相关性，即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受访者的储蓄偏好越强（图4-11、图4-12和图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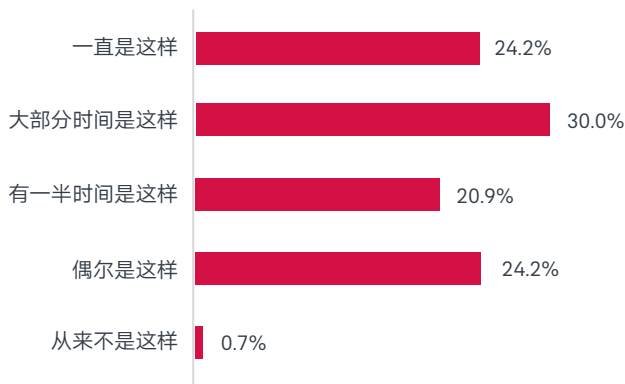


图4-10 定期储蓄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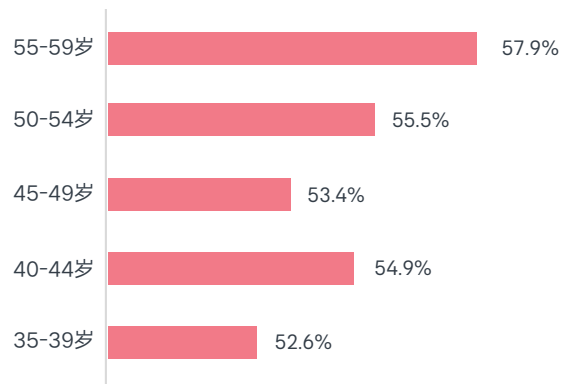


图4-11 年龄与定期储蓄偏好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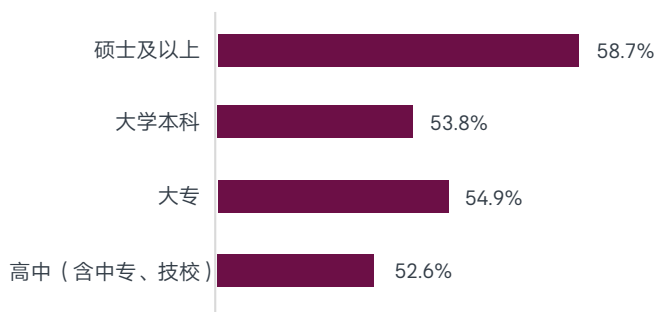


图4-12 学历与定期储蓄偏好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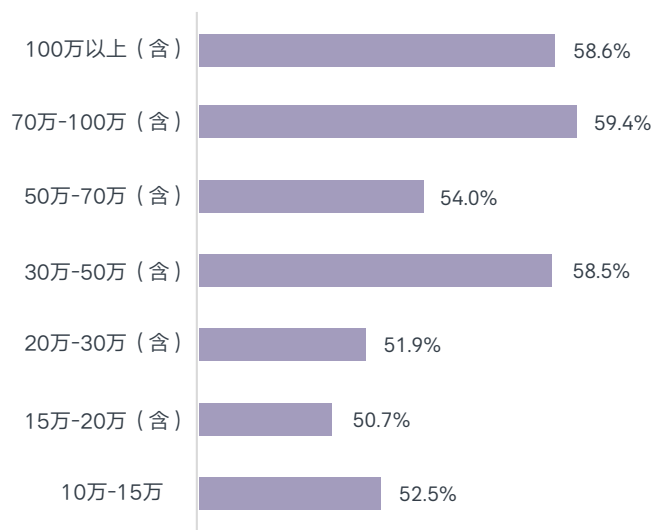


图4-13 年收入与定期储蓄偏好的关系

2. 养老储备工具偏好

在不考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提供年金计划的前提下，作为第一选项，人们最倾向的是银行存款或银行理财，占比高达53.8%，其次为个人商业养老保险、股票和基金，占比均超过10%，然后才是债券、住房等不动产，但占比都很小；作为第二选择，受访者倾向最多的是基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住房等不动产和股票等，基本处于10-20%之间；作为第三选项，人们更偏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商业重疾险、商业医疗险等产品（表4-1）。总之，人们对养老储备工具的选择非常谨慎并且保守，同时这种选择也显示出人们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偏好。

表4-1 基本养老保险和年金之外的养老储备工具选择（%）

选项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第三选择
银行存款、银行理财	53.8	6	3.7
个人商业养老保险	11.3	19.9	22
股票	10.7	11.2	6.2
基金	10.2	22.1	10.1
债券	6	4.9	4.8
住房等不动产	4	16.8	13
商业长期护理保险	2	7.2	14.9
股权投资	1.3	6.8	6.9
商业重疾险、商业医疗险	0.4	2.3	14.3
信托	0.3	2.8	4.1

3. 退休规划实施情况

调查显示，只有7.6%的受访者没有考虑过制定退休规划；但有做退休规划想法的受访者，大部分还停留在不知道如何做和还没有采取行动阶段，总计占比高达54.5%。比较而言，已经为退休规划采取行动的受访者占比仅为28%（图4-14）。上述结果说明，能力和人性（惰性）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行为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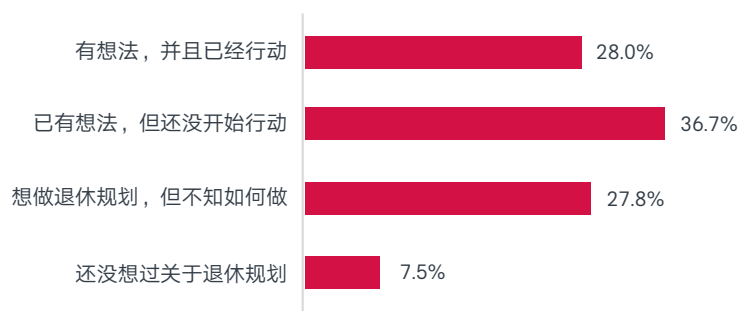


图4-14 退休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情况

(三) 认知规划存在的不足

总的来说，大多数受访者对退休后生活状况保持谨慎乐观态度，同时较高的储蓄倾向也有利于增强个人的养老储备能力，并愿意在退休后健康管理方面增加投入并进行准备。但是，在退休认识和养老规划上还存在一些局限性，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偏见。具体来说：

首先，对社会化养老方式的理解仍不充分。对退休后谁来照护的选择上，选择子女的受访者比例有30.8%，选择依靠自己和配偶的有40.6%，选择养老机构的为21.4%。同时，在养老方式选择上，受访者对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等国内外专家倡导的老龄化社会主流养老方式，接受度仍不高。这说明虽然人们已认识到了现代社会“养儿防老”的局限性，但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意愿和认知仍然不足。

其次，对合意养老储备认识上可能存在偏差。一般来说，不同收入人群退休后消费水平是不同的，通常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二者不是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对消费倾向是边际递减的，所以高位收入人群的养老金替代率一般要低于低位收入者。但是，调查结果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特征，因此人们对养老储备的认知水平还有必要有进一步提高。

其三，储蓄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养老储备。中国是个传统的高储蓄国家，人们有着较强的储蓄和定期理财的习惯，但这种习惯并不必然导致养老储备的有效增加。调查显示，人们定期理财更关注的是短期安全和高流动性的银行储蓄或理财产品，而对长期收益更高但短期风险更大的基金产品则持谨慎态度，同时也对风险较小和流动性低的保险产品认知度有限。

其四，个人养老规划制定和实施难。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储备或必要的行动力，相当大比例受访者并没有制定自己的养老规划，而且即使有些人制定了规划也没有真正落实。道理很简单，养老规划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比如要熟悉一些社保知识和养老服务政策，具备一定的金融和财务知识，或在资本市场上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但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这些课题都过于艰深，而且加上人性存在惰性，制定并坚持实施养老规划的人数依然是少数。因此，这也需要政府提供制度性安排，建立触手可及的“工具箱”，而市场专业机构需要依法依规提供便捷实惠的创新产品，来填满这个“工具箱”。



05

主要结论和 政策建议

自本世纪以来，中国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各国老龄化的实际进展与公众的认知的时间相差在20年以上。认知是行为的关键前因变量，正确认识养老风险，做出更加合理的养老决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所在。

（一）调查主要发现

本次调查覆盖十个大中城市，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中等以上收入群体，人群年龄处于中年阶段，教育层次较高，并具有一定的养老资产准备和较高的金融素养，反映了大中城市典型人群的养老准备情况。通过调查问卷的资料收集、数据整理和模拟测算分析，得出一些参考性结论，主要包括：

第一，从总体规模上看，十大城市养老财富储备水平较高，但仍面临缺口风险——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即把养老金储备、金融资产和第二套以上房产全部用于养老的话，经测算出的总体养老财富缺口仍有10%左右。而由于房产养老存在不确定性（例如遗赠儿女、流动性、房屋贬值等因素），如果抛开房产，风险指数将上升到15%左右；若再进一步考虑到金融资产波动对养老的影响（比如利率下降、金融危机和投资风险等因素），退休收入的可用来源将进一步减少。单纯从养老金收入考虑，测算得出的风险指数为21.01%（目标替代率设定为50%的水平），调查者养老金替代率水平仅为39.5%，与OECD国家52%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在调查样本中，近70%的人并未参加任何年金和商保计划，来自社会养老金的收入替代率仅为35%左右。在国际公共养老金体系中，收入越高养老金替代率越低是一种惯例，需要通过第二、三支柱加以弥补。但当前我国二三支柱养老金还十分薄弱，调查样本参与率均不足20%，这是造成受访者群体存在养老金收入缺口的主因之一。

第二，从分布结构上看，不同城市和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呈现差异化。一是在收入群体上，养老财富储备可能面临两极分化。调查测算数据为城市全部样本的均值，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结构性差别。例如，虽然低位收入群体的个人养老金替代率相对高，但收入水平低，其相对社会平均工资收入的替代率不高；同时，低位收入群体金融资产规模有限，拥有房产的机率低，这些都影响到其退休收入的充分性。相比较，对于高位收入群体来说，虽然养老财富积累规模较大，但相对于退休前的工资收入而言，退休后收入水平明显下滑，退休前后生活水平有较大落差；其主要原因在于退休前的准备不足，例如购买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额较少。在城市间差异上，虽然一线大城市养老财富规模较高，但收入替代率并不一定高，由于较高的生活费用，退休生活仍可能面临较大压力；而对部分风险指数较高的二线城市来说，金融资产储蓄不足和房价低可能是造成财富储备不足的重要原因。

第三，从健康风险方面看，受访者普遍预期到健康管理的重要性，表现出较高的忧患意识，但有效行动不足。受访者最担心退休后发生的两项风险是：“医疗负担太重”和“长期护理负担太重”，占到66.9%和63.7%，并有81.4%的群体认为需要为老年健康风险做好准备。但遗憾的是，虽然认识到了风险，但受访者并未采取足够的行动。调查显示，个人投保商业健康保险相对不足，受访者中有53.2%未购买任何补充性医疗保险；仅有7.4%的人

购买了重大疾病险。总的来看，担忧健康风险的人群数量多于采取有效行动的人数。

第四，从养老金融素养上看，大多数受访者有定期理财的习惯，但投资策略相对保守。受访者中有75.1%选择了大部分时间从事定期理财，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受访者储蓄偏好越强。在理财工具上，存银行占到32.3%，其中各投资理财项目则相对分散。对商业健康保险业非常熟悉，非常了解与比较了解二者之和为70.0%。但从实际情况看，对这类保险的购买比例并不高。

第五，从退休生活预期上看，受访者普遍对未来退休生活持乐观态度，但缺乏退休规划和执行力。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未来退休后生活特别有信心的比例为29.3%，而比较有信心的更是高达56.7%。从实际情况看，虽然绝大多数受访者有做退休规划想法，但有想法并行动的占比只有28%；大部分受访者还停留在想做但未采取行动，或者不知道如何做的状态，能力和惰性极大限制了行动能力。

第六，从对社会化养老的看法上观察，受访者普遍对老龄问题认识不足，认知与行动之间存在着偏差。一是在对未来主要受谁照顾的预期中，受访者中预计由子女照顾的比例为30.8%，由配偶照顾和自己照顾的比率合计达到40.6%。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未来核心家庭占比将越来越高，依靠子女这一预期很难实现，当受访者与配偶走过健康预期寿命之后，依靠自己或配偶将变得越来越难。调查表明，虽然受访者意识到了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的重要性，但依旧没能充分意识到老龄化的冲击，未来的真实需求很可能仍在认知水平之上；二是当前各地推行的“9073”或“9064”的养老模式，与受访者的需求有差距。调查显示，45.5%的受访者将“居家养老（专业服务人员上门提供照料）”作为理想的养老模式上，另外有30.1%和22.2%的人选择“养老院养老（由养老机构提供全天候照料、生活护理和精神慰藉）”和“社区养老（专业养老机构进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完善。

（二）主要对策建议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每个人都需要尽早为老年生活做更多准备。调查结果说明，大中城市中等以上收入群体依然需要面对诸多养老风险的挑战。在政策环境方面，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民生为导向，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其中，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未来养老事业的综合发展目标体系，“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支持路径，旨在构建更加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制度环境，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养老风险，提出如下建议：

1. 普及养老风险教育，形成社会行动合力

在整个社会群体中，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经济条件相对优越、受教育程度更高且社会保障水平更加充分，他们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和各种知识和经验，但在复杂的老龄化面前，调查结果证实他们依旧存在着诸多认知与行动的偏差。显然，单纯依靠个体的力量，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采取正确的应对行动是不现实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风险，既是时代发展的结果，也是时代赋予整个社会的责任。应对养老风险既需要政府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宣传引导，也需要商业机构、社会组织发挥自身的力量，还需要个人树立良好的理念和习惯。总之，在严峻的老龄化形势面前，需要秉持发展的理念，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并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以共同应对养老风险。

2. 打造“适老”商业环境, 提升养老服务能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很难通过少数产品或者服务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多样化的和差异化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 应对老龄化需要商业机构尤其是保险行业加强创新, 针对不同异质化的群体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 从而构建更加“适老”的外部环境。在这个过程中, 建议如下:

一是提供更加专业的系统服务方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未来的社会将产生更丰富的养老商品和服务。但是, 养老不仅是一个金融问题, 更是与人口、健康、经济与社会诸多问题的交织, 专业知识的匮乏是现在乃至将来长期存在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 个体很容易陷入选择困境。为此, 商业机构可以参考国外引入投资默认选择工具(QDIAs)的做法, 通过为参保者提供更加合适的默认选择, 降低选择的难度并提升收益水平, 这既是时代赋予商业机构的责任, 也是机遇所在。

二是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组合产品。受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个体差异(受教育程度、职业、健康、家庭等)等因素影响, 不同个体在收入、风险偏好以及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并将导致他们在应对养老风险需求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 未来社会就业和生活方式很可能更加多样化和去中心化, 商业机构需要提供能够满足多种需求、更加快捷方便的组合产品。

三是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 构建更完善的养老服务网络。通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商业机构可以将参保者个人的健康需求和养老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在医养融合发展的基础上, 向康养、智慧养老等方向延伸, 并构建集文化、旅游、养生等多维需求于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 通过场景化技术, 商业机构可以强化客户对全生命周期的认识, 协助他们在各年龄段主动做出合理产品或服务配置; 此外, 还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集成, 商业机构可以尝试构建更有效的提供物理上和包含信息、知识和精神需求在内的综合服务能力, 例如利用大数据支持, 加强客户健康管理水平以降低风险。

3. 强化全生命周期终身学习, 提升养老金融素养

调查揭示受访者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偏差, 如对社会保障所能提供待遇水平期望过高、对房产和银行储蓄在养老储备中的地位 and 作用估计过于乐观、对未来照护风险认知不足, 等等。养老规划涉及到跨生命周期内的储蓄、消费和金融理财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素养, 需要树立风险意识, 预先筹划, 尽早做出安排。从个体层面讲, 应秉持终生学习的心态, 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准备: 一是加强养老认知学习, 尽早进行退休规划, 养成良好的投资理财习惯。重视财富积累, 尤其是资产配置结构。这有助于更好地配置适合自身的产品和服务, 以更好地应对养老风险; 二是树立养老风险意识, 多元化储备退休财富, 尤其注重弥补二三支柱养老金的不足; 三是做好健康风险管理。一方面通过加强保健投入, 保持稳定的身心健康水平; 另一方面防患于未然, 通过综合性的健康保障计划为退休后医疗照护需求提供储备。四是加强养老金融素养和认知水平, 从工作、学习或兴趣角度出发, 积累起更为丰富的养老知识和技能体系, 这对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清晰的判断至关重要。

附件一 调研问卷概况

(一) 调查目的、城市选择与抽样原则

2021年7月到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社会保障实验室）委托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以养老风险为题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本次调查聚焦于未来15-25年之内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中等及以上收入群体。调查在了解受访者个人及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基础上，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知与行动情况；二是未来各项养老风险情况，并特别关注老年健康准备风险；三是受访者现有保障与准备情况。考虑到老龄化现况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情况，在综合平衡经济、人口规模以及老龄化程度的基础上，本次调查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成都、南京、佛山、武汉、石家庄（排名不分先后）十个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城市，综合分析这些不同条件、不同风格城市受访者的潜在养老风险。

每个城市调查问卷发放量500份左右，共计回收有效问卷5050份。

抽样时受访者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年龄处于35-59岁之间；二是随机进行性别配比；三是户籍仅限城市或城乡合一户籍；四是处于未退休状态；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年收入10万元以上）。总的来看，满足以上条件的受访者，在应对中国未来养老风险问题上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上，率先总结他们的问题、经验和发展路径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上。在满足以上抽样规则的基础上，按照总量随机抽取受访对象。问卷采用网络发放的形式，由受访者直接输入APP的形式完成问卷填写工作。数据的收集汇总由北京零点市场调查有限公司完成，其余校验、数据处理等工作由双方团队共同完成。



(二) 问卷基本情况

1. 年龄分布情况

本次调查受访者年龄区间为35-59岁，不包含已退休人员，受访者平均年龄43.38岁。具体年龄分布为：35-39岁共计1268人，占比25.1%；40-44岁为1639人，占比为32.4%；45-49岁为1346人，占比26.7%；50-54岁393人，55-59岁404人。

表1 受访者年龄分布概况

年龄组	频数 (人)	占比 (%)	累计占比 (%)
35-39岁	1268	25.1	25.1
40-44岁	1639	32.4	57.5
45-49岁	1346	26.7	84.2
50-54岁	393	7.8	92.0
55-59岁	404	8.0	100.0
合计	5050	100.0	

2. 性别分布、婚姻家庭与子女情况

受访者中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男性受访者共计2615人，占比51.8%；女性受访者2435人，占比为48.2%。婚姻状况已“已婚（含再婚）”为主，共计4870人，占比为96.4%；离婚或丧偶者为146人，占比为2.9%；未婚者34人，占比为0.7%。受访者中，无子女者共计112人，占比为2.2%；有子女者共计4907人，占比97.8%；31人未回答该问题，占比0.6%。有子女的受访者平均育有子女1.98人。

在家庭规模方面，受访者平均家庭规模为3.51人，以3人或4人的核心家庭为主，分别占比54.9%和25.8%。家庭规模为5人的占比为11.0%，其他情况占总量比率均小于10%。

表2 家庭规模情况（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含本人）

家庭规模	频数（人）	占比（%）	累计占比（%）
1人	13	0.3	0.3
2人	255	5.0	5.3
3人	2770	54.9	60.2
4人	1302	25.8	85.9
5人	556	11.0	97.0
6人及以上	154	3.0	100.0
合计	5050	100.0	

3. 受教育与工作单位类型情况

在受访者中，最高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共计2996人，占比59.3%，其次为“大专”学历，共计1358人，占比26.9%。其他学历占比均在10%以下。在受访者工作单位类型中，以“民营企业”为主，共计1609人，占比31.9%；其次为“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分别为1066人（占21.1%）和973人（占19.3%），“合资企业”的占比为10.6%，其他工作单位类型的受访者占比相对较小。

表3 工作单位类型概况

单位类型	频数（人）	占比（%）	累计占比（%）
政府机关	209	4.1	4.1
事业单位	973	19.3	23.4
国有企业	1066	21.1	44.5
外商投资企业/代表处	105	2.1	46.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6	0.3	46.9
集体企业	213	4.2	51.1
民营企业	1609	31.9	83.0
合资企业	534	10.6	93.6
灵活就业者	67	1.3	94.9
个体户或受雇于个体户	202	4.0	98.9
其他（社会组织等）	34	0.7	99.6
家庭主妇/主夫	22	0.4	100.0
合计	5050	100.0	

附件二

养老财富储备

风险指数计算方法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Pension Wealth Reserve Risk Index, 简称PWRRI)指的是全国或(单个城市)典型个体在退休时点时面临的养老财富缺口,即退休时积累起的养老资产权益与理想的退休收入替代率目标之间的差距,其计算分以下三个步骤(见下表)。

表1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计算方法

主要指标体系			计算过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来自调查问卷)	第一步: 计算退休时养老财富储备	第二步: 计算退休第一年收入	第三步: 计算退休收入替代率和风险指数
(一) 多层次 养老金 资产	1.基本养老保险	工资收入 参保年限 缴费密度	(1) 基本养老保险资产 权益=退休后每年养老金 领取额累加现值	(1) 基本养老金收入 =基础养老金+个人账 户养老金	(1) 个人退休前工资收入 (S) = 目前工资收入 * (1+年化 工资增长率)^N (年份数)
	2.企业(职业) 年金	年缴费额 缴费密度	(2) 年金资产=历年缴 费额+投资回报	(2) 年金收入=年金资 产/领取年份数(折现)	(2) 养老金替代率(T1) = P/S
	3.商业养老 保险	年缴费额 缴费密度	(3) 商保资产=历年缴 费额+投资回报	(3) 商保收入=年金资 产/领取年份数(折现)	(3) 设定养老金收入目标替代 率为50%
合计			(养老金总财富(W1) = (1) + (2) + (3))	养老金收入(P) = (1) + (2) + (3)	养老金风险指数(I1) = 1-T1/50%
(二) 金融资产	1.个人金融 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规模	(4) 金融资产=当前金融 资产*(1+投资回报率)^N		
	2.未来储蓄 资产	工资收入 房租收入 日常消费支出 健康支出 房屋支出 (租金和按揭支出)	(5) 未来储蓄金融资产 =历年净收入(各项收入 -支出)*储蓄率,计算 累计值		
合计			金融资产总财富(W2) = (4) + (5)	金融资产(折算)收入 (F) = W2/退休余命	金融资产(折算)收入替代率 (T2) = F/S
(三) 房产	房屋价值	扣除第一套房后的房 产市值(假定第二套 及以上住房均产用于 养老)	房产总财富(W3) = 按 目前价值累计到60岁时 的房产价值	房房产(折算)收入 (H) = W3/退休余命	房产(折算)收入替代率 (T3) = H/S
总计			养老总财富(W) = W1+W2+W3	退休总收入(M) = P+F+H	(1) 设定退休总收入目标替代 率为100% (2)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 (I) = 1- (T1+T2+T3)

第一步:根据调查数据和未来的参数假设,计算个人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总额

本报告中定义的养老财富包含三大类:

(1) 多层次养老金资产。养老金分为三项来源:第一是退休时点(60岁)享有的社保养老金权益(退休至死亡期间领取的养老金待遇加总);第二是积累的企业(职业)年金资产;第三类是商业养老保险资产。

(2) 金融资产。根据个人目前的金融资产,以及未来年份内工资收入扣除各项支出后用于投资储蓄的部分,汇总计算得出退休时的金融资产。

(3) 房产。假定个人将所拥有的第二套及以上房屋用于养老,根据目前房屋市价推算退休时点的房产价值。

第二步:计算个人退休时点的退休收入

60岁时点的退休收入=基本养老保险金+年金收入+商业保险收入+金融资产(折算)收入+房产(折算)收入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金根据养老金待遇计发公式计算;对各项年金、商业养老保险收入的计算,采用年金化折算办法;对金融资产以及房产可形成的退休收入,采用按退休余命年均分摊的处理方式。

第三步:计算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

(1) 设定退休时点的目标替代率。目标替代率指的是60岁时个人退休收入相对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合意比例,即满足充足退休生活的理想退休收入相对水平。

(2) 计算退休收入替代率。计算三类养老财富收入在退休时点的替代率,分别为各项养老财富(折算的)年收入/退休前一年的个人工资收入。

(3) 计算风险指数。风险指数=1-(各项退休收入替代率之和/设定的目标替代率),即衡量实际退休收入替代率与理想目标值之间的相对差距。

附件三 专业术语解释

1. 养老财富储备

退休时点积累的各项养老财富权益，报告中统计三项。一是养老金财富：包括退休后各年领取的社会养老金、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收入汇总；二是金融资产财富：个人在退休时点积累的各项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三是房产财富：报告中假定家庭第二套以上房产算作养老资产价值。

2. 退休收入替代率

将退休时积累的各项养老财富折算为退休收入现金流，计算其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重。报告中退休收入包括三项，即养老金收入、金融资产财富折算收入、养老房产折算收入。

3. 目标替代率

能够满足退休生活需求的替代率标准，即合意的退休收入替代率目标。

4. 养老金替代率

个人退休后领取的各项养老金（社会养老金、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收入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比值。

5. 养老财富储备风险指数

退休时点面临的养老财富储备缺口风险。将退休时积累的各项养老财富折算为退休收入，计算个体实际可获的退休收入替代率与合意的目标替代率之间的差额，即为风险指数值。在测算过程中，可分项计算养老财富风险指数。一是“养老金”风险指数，单纯指养老金收入替代率与目标替代率之间的差距；二是“养老金+金融资产”风险指数，将金融资产（折算）收入纳入养老范畴后，计算出的风险指数；三是“养老金+金融资产+房产”风险指数，即三项资产汇总后得出的风险指数。

6. 社会养老保险

国家举办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计划，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三项。

7. 企业(职业)年金

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举办的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计划。

8. 商业养老(健康)保险

个人或家庭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或健康保险计划。

9. 社保缴费密度

参加社保实际缴费年限相对于工作生涯的比重，反映个体实际参保缴费情况。

10. 收入群体

按收入水平由低向高排列，将收入群体划为三组：前1/3人数为低位收入组，中间1/3为中收入组（取所有调查样本的平均收入数代表），后1/3为高位收入组。

11. 健康风险

退休后用于医疗保健、照护等方面的支出需求超出已有储备的风险。

12. 养老认知风险

个体在养老知识、退休生活规划和意愿准备等方面的认知不足。



健康长久好生活